

# 独立阅读

2009 年 3 月

## 细则

- 1、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2、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3、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4、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
- 5、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 [shrbooks@gmail.com](mailto:shrbooks@gmail.com)。

**执行编辑：**苏小和、王晓渔、成庆、言一、汪伟

**助理编辑：**李伟为

**观察员：**文学：戴新伟（广州）、朱 白（广州）、罗四鸽（上海）

经济：苏小和（北京）

文史：王晓渔（上海）

艺术：言 一（成都）、成 庆（美国·波士顿）

**特约撰稿人：**羽良（北京）、严飞（美国·旧金山）、莫之许（北京）、吴强（德国·慕尼黑）、张昕（美国·洛杉矶）、刘柠（北京）、汪伟（上海）、沈展云（广州）、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曾园（昆明）、凌越（广州）、孙骁骥（北京）、程明（济南）、马庆（上海）、张无极（北京）

**翻译：**陈丹丹（南京）、吴万伟（武汉）

## 编者按：

赖声川的新作《如影随行》刚好在去年的这个时候登上北京和上海的剧场舞台。宣传文案称：该剧将给观众带来好莱坞大片般的享受。诚然，时至今日，赖声川对于舞台场面调度，场景切换，以及灯光布景的设计已然炉火纯青；但就剧作本身的内核而言却与好莱坞大片相去甚远。若单从形式上看，反而更接近初期的默片。从而，“好莱坞”一词的凸现，其实彰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符号性特质。许多的流光溢彩盛大繁华更本质而言只是一场符号的狂欢，是恰如电影《催眠》中所述的被符号催眠下的纵情。

尽管梦境与现实之间或许并无绝对之界线，个体也有权选择沉浸在任何一边；但最为重要的事情却是在于梦境与现实作为二元甚至多元的存在。就此而言，独立阅读诸位同仁的努力，亦不过是为这个多维的世界提供一些可以照见不同纬度的镜子。

而本期，肥内在影像方面偏学术气质的文字正好展示出一种不同于大陆常见电影写作的书写之纬。

## 目录

###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

经 济：苏小和

写 作：朱白 朱航满 罗四鸽

文 史：王晓渔

###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

严 飞：龙应台的36封家书

孙骁骥：故乡的异乡人

### 书评

---

刘 柠：“高陶事件”旧话重提，盖棺之论尚待时日

马慧元：给神话消毒，还怪异真实

朱 白：卡佛的书

### 影像

---

肥 内：影像作为视见与被见的中介

### 译介

---

托马斯·阿斯豪尔：破产后的生活——哈贝马斯采访记

##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 ECONOMICS&SOCIETY 经济·社会

观察员 苏小和 (北京, [susumartin@hotmail.com](mailto:susumartin@hotmail.com))

当更多的人把金融危机的根源锁定在人的贪婪原罪之时, 我看见周其仁把思考的重点放在了政府与货币的关系之上。周先生提醒人们: 我们无论怎样谴责格林斯潘多么迷信自由市场, 但要牢记, 格林斯潘是美国, 也是世界最大的央行的行长, 美元发行多少, 不是市场决定的, 是美国政府决定的。到目前为止, 这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第一次直面货币问题与政府利益的关系。这种思维方式显然来自哈耶克。哈耶克的名著之一, 《货币的非国家化》, 其基本论点是, 只有废除各国政府对其货币创造 (money creation) 的垄断才能实现价格水平稳定。可惜的是, 哈耶克的这本书在过去几十年内并没有产生明显的现实影响, 人们讨论得更多的, 依然是如何改进政府垄断的绩效, 而不是终结这种垄断, 如果要讨论货币竞争的理念, 会被讥笑为“政治上不可能”。按照哈耶克的分析, 货币垄断才是构成经济危机的核心, 而政府对货币的垄断是罪魁祸首。所以, 当经济危机来临, 那种指望政府救市的理念和措施, 不仅无助于市场的完善, 甚至会拉长经济危机的期限。

问题是, 这次金融危机到底是因为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 按照哈耶克的路径, 这次全球经济危机, 显然是与货币有关系。肯定是货币的过度发行导致了金融危机, 更失望的是, 政府拯救金融危机的方法, 到目前为止, 竟然是继续加大货币的发行。无论是美国上万亿美元的救助, 还是中国 4 万亿人民币的刺激, 都在沿袭这样的思路。

这样的方法论是正确的吗? 在伟大的经济学家罗斯巴德看来, 这几乎等于朝一个病入膏肓的人身上注射吗啡, 可能有短暂的兴奋, 但接下来将是真正的死亡。我建议真正关注全球经济危机的读书人, 都来读一读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谢华育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4 月)。这是奥地利学派对 1929—1933 年经济大萧条最具有说服力的阐释。当政府无限制扩大货币和信贷供给量成为一种常态之后, 通货膨胀只是我们遇到的第一恶果, 事实上, 这种无限制的扩张扭曲了投资和生产的结构, 使得资本商品行业对不良项目投资过度, 尤其是周期过长, 效率低微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大量的资金沉淀在不可变现的固定资产中, 导致资金突然不足, 投资项目纷纷下马, 银行贷款难以收回, 信贷收缩, 萧条由此汹涌来临。在每一个繁荣时期, 资本商品价格的上升幅度, 总是大于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幅度, 由此, 商业周期中的衰退期就不可避免了, 因为衰退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修正过程, 通过市场的修正, 市场将清算繁荣期的那些不当投资, 将资源重新从资本商品行业引向消费品行业。



如果罗斯巴德和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是正确的, 那么政府唯一的办法, 就是停止通货膨胀, 也就是央行停止扩大货币供给量的操作, 央行不能降低准备金规定, 也不能在公开的市场购买任何资产。金融危机的问题, 不在于商业垄断, 不在于工人组织的煽动, 不在于投机活动的猖獗, 也不在于消费者的贪婪, 本质的问题在于政府自身在货币的发行领域多年来持续伪造并扩大, 而且这种伪造和扩大, 竟然是一种合法的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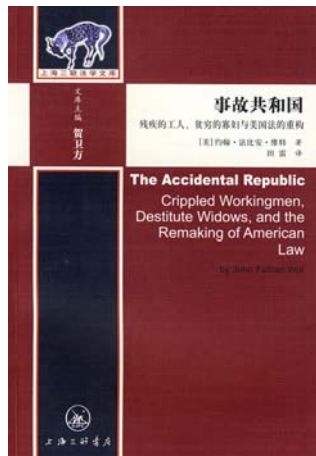
这就是整个经济发生链最核心的地方! 政府是整个社会中惟一拥有权力进行伪造活动、发行新货币的机构。一旦政府习惯使用了这样的权力, 我们将继续遭受通货膨胀, 甚至通货膨胀的失控可能最终摧毁通货。

眼看着各国政府惊慌失措地推出各种货币刺激政策, 奥地利学派的拥戴者们显得非常悲观。事实上, 在我们看来, 解决经济萧条的办法并不复杂, 这就是真正结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结束政府对通货膨胀的推动, 对货币供给的控制, 尤其是结束政府对萧条期市场自发调整的干预, 我们才能战胜现在和将来的经济危机。罗斯巴德断言: 只有使政府完全远离货币供给和经济领域, 我们才能走进一个以企业为主导, 真正自由而去障碍的市场经济。

不过, 真正的先知总是被人们忽略。罗斯巴德的声音, 即使在美国, 也变得希微。所谓大音希声, 其意义大抵如此。每次遇到经济危机, 人们总是会想起罗斯巴德的这本书, 但每次经济出现了一些好转, 人们又迅速忘记罗斯巴德的提醒, 转而回到过去的老路上。

中国的情况比这个更为糟糕。一个真正有力量的学者在这个国家总是遭受打击, 这几乎是一个常态了。我要说的, 是

贺卫方先生。他先是在浙江大学受阻，只好再返回北大。就在人们以为贺先生可以在北京大学继续执教的时候，却又传来他被发配到遥远的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 2 年的消息。我还能说什么呢？悲凉，绝望，愤怒，都没有具体的意义，事实上我正在阅读贺先生主编的上海三联法学文库中的一本书，美国人约翰·法比安·维特的《事故共和国：残疾的工人、贫穷的寡妇与美国法的重构》（田雷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 年 6 月）。



这当然是一本真正的法学著作，不过我在其中读到了太多的经济学的痕迹。我们的国家每年都被一连串的工业事故缠绕。隔一段时间总有煤矿会坍塌，火车也会在人们熟睡的时候偶尔相撞。一次焰火游戏，能叫摩天大楼熊熊燃烧，而一场地震，能震垮所有本来就单薄的校舍。看看这个时代，总是那些脸面深黑的矿工首先被吞没，总是那些还在教室里读书的孩子首先被埋葬。这样的事故纷至沓来，我们先是落泪，继而是愤怒，接下来就是麻木，就是遗忘。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这些悲伤的事故接二连三的发生，而我们的行动仅仅停留在悲伤的层面。没有人告诉我这一年因为事故死去的人有多少；没有人告诉我这些已经死去的人，最终得到了什么赔偿；没有人告诉我，那些死去了的人的亲人们该如何继续活下去，他们内心的悲伤与绝望，有没有人去关注；也没有人告诉我，我们究竟是依据什么法律条款来给死难者进行赔偿。更让我不解的是，每次事故发生之后，就有最高领导的指示迅速传遍祖国大地，但每次的情况却是，上一次的领导指示还有余温，新的事故却又大踏步地来了。

这显然不是常态，肯定是某个本质问题被我们忽略了。

《事故共和国》，讲述的正是美国工业事故的危机及其所引发的美国法改革，甚至是经济发展方法的变革。历史作证，正是频频发生的工业事故，引发了美国社会、制度和法制改革中的一系列大规模试验。法官与法学家发展出了侵权法的法律领域。大部分美国人因此加入了新成立的生命保险项目。工业雇主，也就是企业和企业家发展出处理劳资关系与雇佣合同的新方法。进入 20 世纪，美国的律师、立法者、社会保险专家、劳工领袖，甚至还有企业和企业家纷纷发起了大量关于工业事故的社会后果的研究，并由此评判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改革选择。在 1909 年到 1913 年之间，美国联邦与各州共有 28 个委员会研究了工业事故问题。而从 1920 年开始，罗斯福总统倡导的赔偿体制，在 42 个州落地生根，它以政府强制管理的保险体系取代了 19 世纪的普通法。美国人的《事故法》由此登堂入室，工业事故从此由一种普遍的困局过渡到了法律的中心地带，并成为整个 20 世纪、21 世纪美国律师、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议题。

维特将醒目的工业事故史提升到美国法变革的高度进行观察，是想揭示出一个历史现象：事故法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 20 世纪、甚至 21 世纪美利坚共和国的基础。由此，美国才真正开始走出粗放的工业化时代，表现出更多的现代国家特征，包括在今天的美国人看来非常重要的联邦制原则、无所不在的社会保险体制，都是从事故法开始。

这正是维特之所以要将他的这本著作命名为《事故共和国》的深意。一些看上去血腥、悲伤、简单的事，却启发并形成了美国制度的变革。从林肯时代到罗斯福时代，美国人的治理原则由此发生了深刻的转移。从前，美国人眼里的事可能仅仅界定在关于契约自由与私人所有权的意义和范围之内，但今天，美国人看事故，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分配契约自由所带来的风险，是最大限度地遵守了每个人的个人权利。上帝主权所赐予的“天赋人权”理念再一次成为历史演进的关键词。所以，维特在讲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专门借用了 20 世纪中期法学家格兰特·基尔默的话：这是一段侵权“吞并”契约的过程。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的事现场应该吸收美国事故历史的种种经验和教训。但当我们把这样的问题提出来，立即发现我们的底气不足。一件件令人难过的事不断上演，我们的社会、制度和法律体系，有没有可能就进行一些必要的试验？我们的法官与法学家有没有可能沿着侵权的角度，去探索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条款？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有没有在劳资关系与雇佣合同上找到一些新方法？我们的非政府组织，我们看上去庞大的律师团队、我们的立法者、社会保险专家，尤其是那些以企业家之名先富裕起来的人们，有没有谁站出来发起关于工业事故的社会后果的调查研究？

没有，一个也没有。面对频繁的事，这个国家的人们，多数都是一些冷漠的看客。除非事到临头，我们才发现，那一声声的丧钟，并非只为他人而鸣。当那些凶恶的瓦斯爆炸，一口口陈年的矿井坍塌，当泥石流冲刷了村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要伸出援助之手的。做官员的，要如实告知；做媒体的，要了解真相；做律师的，要去打官司；做企业家的，要去救人。那些机关大院里的决策者们，要检讨我们的制度是不是有问题，那些学院深处的学者们，要走出象牙塔，走到事



故的现场里去，做一些真正的田野调查，去发现我们的方法是不是有问题。

没有，一个也没有。面对那些血淋淋的生命，这个国家的人们，多数都远离了事故现场。因为所有人都以为，政府才是拯救事故的主角。是的，政府总是在每次事故暴发之后，第一个来到现场，官员会落泪，个别人会因此丢掉官阶。但政府依然不改初衷，像垄断所有重要的市场资源一样，垄断了事故的知情权和处理权。他们以为更少的人知道事故，就可以更好地处理事故；或者他们以为，更果断地处理事故，就可以减少新的事故的发生。但这次，他们又错了，政府这么做，不仅再一次堵死了社会救助通道，而且让政府本身的救助成本不断攀升，以至于到了防不胜防的程度。而民众越来越对政府的管治能力不信任，整个社会因为频繁发生的工业事故，积累成为一个个醒目的不稳定因素。

这样的局面让人失望。按照美国的故事史，国家由事故切入，可以找到一种制度变革的路径，民众也可以用内心的悲悯善意来参与其中。但结果却是，政府垄断再一次忽略了变革的契机，民众的旁观者姿态，让民众慢慢发展成为一个个情绪急躁的火药桶。

还是格兰特·基尔默的“侵权吞并契约”的过程描述，让人恍然大悟。以市场为基本路径的工业化进程，主要由契约精神来维系，而契约的主体，尤其是主体拥有的权利，比如私有产权、知情权等等，就成为整个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石。当一个政府的权力完全不受制约的时候，企业就只能把官商勾结当作发展的主要方法，由此，政府权力的滥用，由政府公共决策的层面蔓延到企业经营的层面，这种权力的一层层垄断，必然侵害市场终端。比如工厂的安全设施、工人的安保条件，这些必须的生产权利，必然会被一层层稀释。在这种局面之下，所谓的契约，所谓的以人为本，所谓的生产效率，都只是一句口号，一个幌子。

生命就是在这样的幌子下，被一个个伤害。



2009, 3.23 常宁矿难

## ESSAY&STORY 散文与小说

观察员 朱白（广州，zhubai@tom.com）

春天不是阅读的季节？那春天应该干什么呢？用来回忆，因为回忆远比憧憬更让人踏实；用来消磨，因为消磨要比干坏事强点；用来折磨自己，因为至少折磨自己比虚无要充实多了……春天里最应该做的最好的事情，不用我说你也应该知道。有部电影叫“适合分手的季节”，里面的场景是秋天或者冬天，反正不会是春天，春天即便不发生什么美好之事，也不应该这样反“常识”吧。但，事实不以你的矫情为转移，她飘忽地离去，正如她在你意想不到之时的来临。世事常常如此。没有偶然，这世界就没多大意思了。



当我们不再拥有时，才觉得回忆如此重要。大概是鬼使神差吧，两月前就看了的《圣诞节忆旧集》（[美]杜鲁门·卡波特著，潘帕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1月），一直竟然没有推荐过，本来圣诞、春节读这样一本亲情温馨的小说是非常合适的，不过作为报告的主人，我觉得这个时候迟来的推荐更符合心情。卡波特（不知道为什么要把早已熟知的卡波特译成卡坡蒂，绕口，陌生）的最初印象是那部不错的同名传记电影，我才知道美国有“非虚构小说”这回事，当然，即便后来我找来《冷血》看的时候，并不觉得喜欢这位作家，密集的语言，冷酷的描写，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作家不是在写自己的事，甚至可以刻薄地说故事跟作家没什么关系。这本《圣诞节忆旧集》首先是份精美的礼品，装帧和设计都非常适合当礼物送人，卡波特也一反我心中早形成那种隔膜印象，在三个短故事中大肆张扬温情和少不更事的记忆。虽然回忆的内容尽是美好之事，但回忆本身并不美好，因为只有失去你才能够想起来回忆过往。

看电影买碟的时候，一般我都不会错过看不错的导演的处女作，因为在我看来那是积攒了许久的一次爆发，也很大可能是一部导演真正有感受的作品。帕慕克的《杰夫代特先生》（陈竹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2 月）也是属于此类，并且没有让人失望。普通人的普通梦想被打翻在普通的漩涡之中。这甚至比西西弗的神话还要真实和频繁，凡庸的大多数，面对繁杂的生活，难免迷失其中，帕慕克的真情也就流露在这处女作的最初情意之中。



最近关注的小说似乎总离不开电影的“阴影”，是我电影看多了，还是小说不够了？《朗读者》（[德]本哈德·施林克著，钱定平译，译林出版社，2009 年 2 月）也是一样，名字大家都不陌生，奥斯卡和金球奖都出了风头的凯特·温丝莱特主演，电影非常朴实动人，故事充满人类自己解决不了的人性悖论，不让人痛快，没有人能够一下子得出答案，在选择过程中挣扎，同时也骄傲地拥有了最伟大的爱情。小说令人更加着迷之处在于，它非常耐读，且是在保证流畅阅读的前提下完成的。作者本人甚至不是我们称之为专业作家的人，他的正业是法律事务，但在我看来，正是这种“业余”保证了小说这种传统艺术的纯良，没有被玷污过后的美化，也没有矫情的文学理论。真正的好小说不需要这些，从来都如此。如果读者不嫌我啰嗦，我愿意在这里将故事里的爱情作以合适的对比，约翰·欧文的《盖普眼里的世界》（张定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7 月）里也讲述了一段让人心痛不已的爱情，丈夫面对背叛的妻子只能选择原谅和一起救赎，因为这里面有爱，有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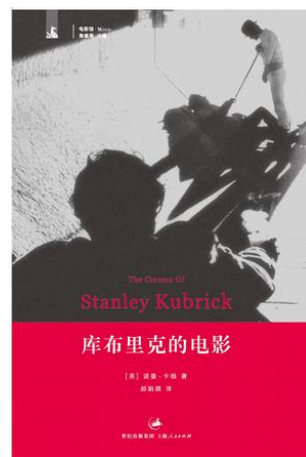
能战胜的爱，越痛越知道爱的程度。在我粗鄙的见识里，我以为《朗读者》中的汉娜和迈克的不计较年龄和空间、时间的爱，还有《盖普眼中的世界》里盖普与妻子的爱，是人类文艺作品中为数不多的爱情之一，他们将见证人类尚且拥有这一美好情操。

最初看到《返老还童》是在张力慧翻译的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疯狂星期日——菲茨杰拉德中短篇小说选》里，那时名字还叫“本杰明·巴顿奇特的一生”，离奇也神奇的一个故事，人在老与少中颠倒，人性在倒转中煎熬。因为热门电影的原因，《返老还童》（张力慧、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年 3 月）以简介的形式、精美的包装又再版了。赶时髦总是一件时髦的事，适当凑凑热闹也是针对凡庸生活的一次策反，成功不成功你都赚到了，因为阅读比做其他傻事安全、节省。

“fei ci jie la de”这个汉译的名字读起来有点拗口，叫这个名字的作家不止美国那一位。英国作家菲兹杰拉德也是一位值得关注的作家。菲兹杰拉德大器晚成，颠簸一生晚年终成一位作家。可以想像一下，作家青年时代只能在所谓的工作和饭碗之间转悠，无论成功与否都只能有这一种选择，如果放弃工作去写作，可能他自己都会觉得不靠谱，只有到了晚年，一切即将离去，并且无法更改，不用在做任何场尝试时，他才开始安心当起作家。所以大器晚成似乎是一个不得不的事情。《离岸》、《天使之门》（周吴俊译，新星出版社，2009 年 1 月）都是作家的代表作，看得出老来的那种老练和精湛，即便你不赞叹作家的技巧，也会为其中的优雅和简洁感到激动。

电影导演贾樟柯出版了《贾想 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记》（贾樟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3 月），在看过《二十四城记》之后我不想看这本书了，还是那个“当代中国人”的命题，贾樟柯也毫无疑问地没有躲开。一个拍出《小武》或者《站台》的人，是在底层中彰显出人的诗意的创作者，而拍了《二十四城记》这样的超级大广告的电影后还在贩卖所谓的诗意，就是一个不诚实的人。不诚实的人的作品，我建议读者不要再犹豫了，省下时间多看看那些经典也不要冒这个险。即便这本书记录的大部分电影都值得珍藏，但在贾导演这样的贩卖下还是难免会有被蒙骗的感觉，是不是世上的所有生意都可以有诗意呢？我禁不住想问。当然，问了也白问，除非你期待的只是一个伪装、善辩、精巧的诗意回答。

美国导演库布里克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最不可替代的那一个，如果有天生的艺术家的话，库布里克肯定是一个，人类的一个个极限也正是在这样的人面前完成的。《库布里克的电影》（[美]诺曼·卡根著，郝娟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1 月）以那经典的十三部电影为线索，阐释和接近了伟大的库布里克，《库布里克的电影》详实地描述了库布里克所有作品，用文字来解答电影，好像总没有什么必要的理由，但即便从资料性上来说，这也应该是一本如我这样库布里克影迷的绝对选择。



## LITERATURE&NONFICTION 文学·非虚构

观察员 朱航满(石家庄, zhm7976@126.com)

春节过后,收到广州诗人世宾寄来的两册民间诗刊《诗歌与人》,均是由南方诗人黄礼孩主编的刊物,其中一册为《新诗 90 年序跋选》,一册为《蓝蓝诗选》。这两册诗歌杂志的专辑制作精致、柔软、优雅,在初春的阳光下阅读,有一种精神上的幸福感,它们均是为这册民间诗歌刊物诞生十周年奉献的礼物。在这十年间,诗人黄礼孩便是以一个人的精神维持着这册具有理想主义气息的诗歌刊物,以这本厚达 563 页的《新诗 90 年序跋选》为例,收录了中国新诗诞生 90 年来的 150 多篇优秀诗歌序跋文章,读来犹如回顾一部中国新诗史,黄礼孩称其为一册“记忆之书”,可谓恰切。我在《文汇报》上偶然读到一篇关于这册诗歌刊物诞生的报道,其中写到诗人黄礼孩为了编辑出版这册民间诗歌刊物,并保持其一流的精神水准,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劳作,其代价是上百台晚会的串词和不间断的专栏写作,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则保持了最简朴的生存状态。



近乎一个月的时间,我都在断续的阅读这册《新诗 90 年序跋选》,它让我感受到一种精神劳作的价值所在,感谢诗人黄礼孩。尽管我对于中国诗歌属于一个门外汉,但经常能从中国诗人的诗作和努力中感受到一种精神的品质,刚刚读过的这册由诗人西渡和王家新所编选的《访问中国诗歌:中国 23 位顶尖诗人访谈录》(汕头大学出版社,2009 年 1 月),其中就有很多我个人所欣赏的诗人,诸如昌耀、王家新、柏桦等人的诗歌作品,西川、蔡天新、朱朱等诗人的随笔,以及张曙光、黄灿然等诗人的翻译作品,还有他们所编辑印刷的诸多独立民间诗歌刊物。读完这二十三位诗人的访谈,印象中他们大多知识博杂、技艺精巧、视野开阔,这大约也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诗歌写作,而读完这册书后,我意外在此书的后记中读到一个让人感动的细节,诗人和编选者西渡写到,这册诗歌访谈录在出版过程中可谓一波三折,其间曾得到在一家中原出版社任职的张旭辉先生的热心帮助,但在编辑过程中因为意见不合,张先生多次与自己的上司发生冲突,最终成为他离开这家出版社的导火索之一。我觉得中国的诗歌事业,也很有必要记住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名字。

据诗人北岛回忆,当初《今天》杂志在编辑流传时,陈凯歌曾是杂志在北京电影学院的负责人,那个时候,陈凯歌是热情的诗歌爱好者,并曾有小说发表,在北京玉渊潭公园举办的朦胧诗人聚会上,他还当众朗诵过诗人食指的诗歌《相信未来》。而在陈凯歌后来出版的传记《我的青春回忆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 1 月)中,他以这首食指的《相信未来》和北岛的《回答》为自己的青春记忆作结。《我的青春回忆录》最早以《我的红卫兵时代》在日本出版,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少年凯歌》为名出版,尽管不到十二万字的回忆录,但足以展示作为诗歌爱好者陈凯歌的才华,其间对于自身与历史的反思和拷问可谓当世少见,而对于自己经历时代的认识也难得有一种清醒的批判意识,这些都或许与他作为朦胧诗歌的一员有着难解的联系。读完这本书,对于理解陈凯歌所拍摄的一系列的电影作品都有着直接的帮助,我以为这册回忆录与他最好的电影作品一样杰出。诗歌并没有真正离我们远去,诗人在我们这个时代中也并没有完全隐没。

止庵的《周作人传》(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年 1 月)是当下传记出版中非常独特的一册,读后的最大印象是止庵对于周作人传记写作的良苦用心,这本书在资料的挖掘与整和上达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其熟悉资料的程度估计在当下很难有与之匹敌的了,诸如他曾考证周作人与鲁迅在绝交后曾有数面的相见,便从两人的日记中的记录互相进行对比,又根据当时的情境进行逐一判断,可谓下足了功夫,而这番考证也仅仅是此书中一句话的一个注释而已;《周作人传》的另外一个印象则是作者止庵在趣味上与周氏的靠近,也因为这种相似,止庵在作传时的笔法、情趣、行文、结构等都很有些周氏的味道,特别是在对周氏的人生起落的叙事时,就能很体贴的写就,资料与运笔也都多了几份的理解与宽容,这是此册传记写作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因此,止庵的作传看似客观冷静,其实感情却是饱满和热烈的。曾有书评人将止庵的这册传记与钱理群先生的《周作人传》作比较,仅就两书开篇文字的对比,就判断出孰优孰劣来,我读后就颇不以为然,因为钱先生与止庵的性情大为不同,钱先生是以鲁迅的精神趣味来衡量周作人的,而止庵则是以周作人的趣味精神来衡量周作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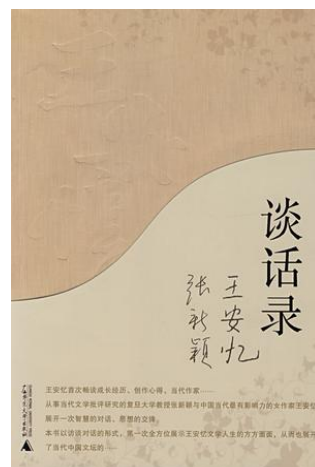
自然差异很大，笔法也更难相提并论了。书评论者同样作为周氏文章的爱慕者，难怪会如此看不上钱理群先生的传记著作，但即使进行比较，也请以详细的论证来进行判断，而不该如此轻率就作结吧？



陈渠珍所著的《荒野尘梦》（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是一本传说中的奇书，之所以称奇，原因大约是此书一直难见真面目，长期以来只能以手抄本、复印件和内部出版资料等形式在民间流传，我也曾多次偶读片段，诸如在作家祝勇写成的散文《一个军阀的早年爱情》中就曾记之；其二是作者陈渠珍身世崎岖，此人先后经历清朝、民国和共和国三个不同的时代，与熊希龄、沈从文并称为“凤凰三杰”，熊希龄曾官至民国副总理，沈从文则是现代以来中国文坛上独一无二的大师，而陈渠珍作为一介武夫，他以清朝官员身份进入西藏进行平叛，后来又数十年经营湘西，人称“湘西王”；沈从文曾担任过陈渠珍的文书，在他后来的自传中就曾这样描述过陈氏：“那军官的文稿，草字极不容易认识，我就从他那手稿上，望文会义的认识不少新字。但使我感动的，影响到一生工作的，却是当时他那种稀有的精神和人格。天未亮时起身，半夜里还不睡觉。凡事任什么他明白，任什么他懂。他自奉常常同个下级军官一样。在某一方面说来，他还天真烂漫，什么是好的他就去学习，去理解。

处置一切他总敏捷稳重。由于他那分稀奇精力，军队在湘西二十年来博取了最好的名誉，内部团结得如一片坚硬的铁，一束不可分离的丝。”其三则是这册由陈渠珍写成的私人笔记《荒野尘梦》，因其写进藏平叛经历之艰难，写藏地人文景观之独特，写社会环境之复杂，还写与一位西藏姑娘西原的爱情故事之曲折离奇，可谓是全书最华彩动人之处。更为难得的是，这册私人笔记语言典雅，描写精妙，惊险曲折处，栩栩生动，如在眼前。作家马丽华曾根据这本书写过一本长篇小说《如意高地》，可谓此书在当代文坛的又一谈资。

最后谈谈作家王安忆与批评家张新颖合作的《谈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这是偶然翻阅过的一册对话文集，但对于了解王安忆以及当代中国作家的写作有着很大的帮助。在此书中印象深刻的是王安忆谈到作家路遥的写作方式，因为路遥写得太苦太累，这让她很不理解，王安忆认为路遥是以艺术家的方式对待文学的，而自己是则以匠人的方式来对待文学的。读这册书，我感觉王安忆对于文学的艺术感觉很敏锐，但也不过是一个文字的工匠而已，因为她缺乏对于文学宗教般的敬畏与付出。这也是当下诸多作家所存在的问题之关键，可惜我读王安忆的对话文字，发现她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危险，并把这作为自己写作之所以能够不断进行下去的支撑和来源。因此，读这册对话集，心中充满了失望，倒是一些细节让我产生了兴趣，诸如这册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回忆陈丹青的部分，这与我读现在陈丹青的文字以及他在大众媒体上的形象很不相同，作为一则资料我愿意在这里重新叙述一遍。根据作家王安忆的回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她到美国去访问，经过介绍认识了在纽约的画家陈丹青，第一次见面时陈丹青在纽约林肯中心的喷水池旁等候，神色很严肃，随后他便带着王安忆到大都会博物馆去参观。陈丹青那时刚到美国，英语十分糟糕，对于外文有一种本能的拒绝，精神很苦闷，依然以读中文著作为主；王安忆送给陈丹青两本关于知青生活的小说作品集，他就带着在地铁上读，结果一边读一边哭，但没有人知道这个中国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 LITERATURE&MAGAZINE 文学·杂志

观察员 罗四鸽（上海，zhm7976@126.com）

最近一直腰腿酸痛，于是，要看完一本当代作家的长篇小说，几乎变成了一个体力活。因为每隔一两个小时我就痛得龇牙咧嘴，不得不站起来活动活动，这让我差不多三四天才勉强看完一本小说。但关键问题还不在此，而是每次等我回来再接着看，我已经记不清楚小说在讲什么，不得不重新开始看，有时候一天下来，我只看了一个开头，



仍然不知道说了什么。第二天，再从头看，已经生厌。最后，只能以李素丽的精神勉励自己，才把小说看完。虽然有的小说不坏，但若认真推荐，却又不敢，只能胡写下我的印象，仅供参考吧。

如果说王安忆是上海的“地望”之一，那么方方便是武汉的地望之一。虽然学界多赞扬她的《风景》和《奔跑的火光》，但我最为喜欢的是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因为前者用专家术语说，是以内容（展现了真实的底层人民的生活）与艺术（独特的视角）取胜，而后者则似乎是从方方心里出来的，有她的独特思考却又不抽象枯燥，颇见性情。但对于此次方方的新作《水在时间之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1月）有些让我失望，若是与《风景》相比，内容艺术都略输文采，若是



与《祖父在父亲心中》的反思与思考相比，就更不能相提并论了。方方在她的《后记》里说，她想写一个与城市有关的故事，写一个汉剧艺人的故事，写一个好看的故事。小说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并让我们了解到汉剧历史以及鲜活的汉口人。同时，方方也在后记中说到：“这是一本有关尖锐的书！”小说似乎也做到了这一点，从富有哲理的题目便可看出。但糟糕的是，小说似乎太过于主题现行了，如在短短两三千字的引子中，就出现几段类似这样的话：“这世上最柔软但也最无情的利刃便是时间。时间能将一切雄伟坚硬的东西消解和风化。时间可以埋没一切，比坟墓的厚土埋得更深更沉，又何谈人心？脆弱的人心只需时间之手轻轻一弹，天大的誓言瞬间成为粉末，连风都不需要，便四散得无影无踪。”这种汪国真式的句子，让《祖父在父亲心中》中留给我的那种味道有些变味了。到了故事后半段，为了围绕这个主题，人物情节就有些变得生硬而有些不可信了。不过，我还是想表达一下对作者方方的敬意，至少，对于了解汉剧、了解汉口是不无裨益的，小小推荐一下，三颗星。

但对于另外一位著名作家的新作，张贤亮的《壹亿陆》（《收获》，2009年第1期）我便只能标上负五星，并表示绝对的失望。小说讲述的是一个“精子危机”的故事：靠废品收购走入城市，后成为商界巨子的王草根收购了一家医院，暗藏的心思是有一个男孩传宗接代。可是他的精子已经绝灭，需要借种生子。优生专家刘主任意外发现，有个年轻人“壹亿陆”，竟然拥有高度活跃的一亿六千万的精子。最后各方人马为这个优异的“人种”展开了一场争夺与保卫战……然而，小说读完后，感觉却像一场粗俗的关于“生殖能力与精子、性生活的关系”的科学知识普及讲座。作者虽然称小说“前无古人”，我却认为小说的失败也是“前无古人”。

在看完张贤亮的小说后，我曾在飞信上对一位文学杂志编辑抱怨，说为什么著名作家写的小说反而让人更失望呢？这位编辑说，我从来就只看二线作家的作品。对此，我只能发去一个无奈的笑脸。或许，最美好的阅读记忆是活跃在八十年代的那批作家的作品留下的，但如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给人的只是失望，并让此后一代一代可能会超过，甚至已经超过他们的作家一代比一代早夭，比如朱文韩东为代表的“断裂”，比如活跃在各省的文学青年，比如至今可能还埋藏在垃圾堆的无名作家，甚至有以电子版手抄本形式在朋友间流传自己作品的作家。在此，我想推荐一部只在朋友间流传的短篇系列小说集《在界山大阪》，小说以一个货车司机在新藏公路上的界山大坂抛锚为线索，讲了四个故事，平淡中见惊险，将人的孤独写得彻骨入髓却又不失温暖与希望。此外，我并不避讳，作者须弥山主人确实是我的朋友，我是无意中看到这部小说认识他的，当然，只是网友，虽然很不喜欢网友这种性质的人，但这位除外。



从中西作家比较，其实还是可以看出各自的长处与短处的。比如中国女作家蒋韵和法国女作家帕斯卡尔·罗兹（Pascal Roze）的比较。一个“迹”字，让参与去年“两仪文舍”活动的蒋韵和帕斯卡尔·罗兹（Pascal Roze）不约而同地联想到水、生命的消失和女性，并以此为题，分别写下两篇风格迥异的短篇小说《迹》和《水中击》（《天涯》，2009年第1期）。蒋韵的《迹》，以江永地区神奇的“女书”传说为背景，讲述了两个“结老同”（结拜姐妹，相约永生不嫁）的少女，一个因爱情违背誓言，一个在“潇水”中殉姐妹情而亡的故事，将蒋韵《隐秘盛开》《心爱的树》等小说中女性坚贞纯洁的情感和生命自由的向往的主题凝结成一个晶莹的童话，并延续了其《白蛇传》的风格，一唱三叹，婉约回转，意象空灵。而1995年度龚古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卡尔·罗兹的《水中击》，



则写一个已过中年默默无名的单身女演员，跳入海里试图自杀后又重燃生活欲望，终获搭救后平静地继续自己生活的故事。平淡的情节中蕴含着不动声色的力量，带有明显的法国新小说派叙事手法。两篇小说，一个是对消失在历史烟雾中的古典之美的追寻；一个是对消失在沉重生活中的现代心灵的关注。

虽然，我并不喜欢过分推崇国外小说并视为写作指导老师的行为，但在看方方小说时，让我想起J.D.塞林格《抬高房梁，木匠们 西摩：小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2月）这本最近让我着迷的中篇集，并愿意为这本书以及他之前的两本《九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8月）《弗兰妮与祖伊》（2007年9月）贴上推荐正五星的标记。熟悉作者的人都知道，塞林格其实是在用他的小说在评说抽象的禅以及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美国青年们混乱的信仰与思想，而他笔下的西摩是他眼中最为推崇的禅师或是道家形象。在论及这个抽象的东西时，他的口吻犹如一个孩子，写的也是生活上一些琐碎的事情，很少抽象地说理。比如，小说中的我在说自己的肝炎时，突然插一句：“西摩十一岁的时候，有一次在电波里说，整部《圣经》，他最喜欢的一个词是——看！”再无赘言，却让我琢磨了很久，庄子的《齐物论》耶稣的仁慈、生活的奥秘以及西摩不知何来的幸福……

若是把擅讲故事的塞林格的这些围绕着格拉斯7兄弟的中短篇集中起来，按前后顺序看，便有着侦探嫌疑小说的味道，如《九故事》中最为人称道的是第一篇《香蕉鱼的好日子》，西摩与妻子度假，妻子在与母亲通长途，西摩在沙滩游泳，回到旅店开枪自杀。这个在开篇就死去的大哥，便是这个悬疑故事的主角，吸引人从开头一直追到结尾。《抬高房梁，木匠们》依然是塞林格之前中短篇小说的风格，两段场景，有些无厘头的题目，整个故事围绕着西摩这位缺席逃跑的新郎，却始终没有出场。即便最后解密的《西摩：小传》中，这位主角仍未出场，好在塞林格最后给他细细画了一副白描，终于让我们见到西摩的庐山真面目：眼睛有些斜视、鼻子大下巴短、耳垂肥厚、皮肤黑却干净、毛发重却过早秃顶、衣服总是不合身领带总是打不到位，其貌不扬甚至有些丑陋，整日没理由地兴致勃勃神采飞扬，所有的楼梯都一概蹦着上去，活脱脱一个西方俗世中的小“庄子”形象，而西摩的种种行为似乎也得到解释，又似乎无需解释。在这篇小说中，塞林格一反其之前中短篇小说的风格，絮絮叨叨却又不失睿智幽默，看似简单却意味无穷，表面讲着西摩的诗歌与面貌，待回头一看，处处禅机，原来是在说一个西摩之禅。在《九故事》中的《为埃斯米而作——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一篇中，塞林格讲了一个小故事：克莱将他打死一只猫的事写信告诉洛雷塔后，洛雷塔心理学课的全班学生和教授在班上班下进行十分严肃讨论，认为克莱打死猫是由于炮轰而暂时性精神失常。在《西摩：小传》中，塞林格对业务繁忙的“新弗洛伊德艺术文学诊所”里“审美病理学”专家们以及如今的“学术溃疡”更是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这让我几乎不敢再肆意放言了。《五灯会元》载：（僧人）问：“学人乍入丛林，乞师指示。”师（从谏）曰：“吃粥了也未？”曰：“吃粥了也。”师曰：“洗钵盂去。”

好了，到此为止，抛开小说，洗碗去。



## HISTORY&CULTURE 文史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xy1978@hotmail.com）

在书评领域里最受关注的当代中国学者，2007年度是杨奎松先生，2008年度是徐贲先生。杨奎松的《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在出版之前多半会被资深出版人打入另册。作者在专业以外名声有限，内容以带有注释的学术书评为主，又没有学术出版基金赞助，这种书能够保本就已经不错了，谁想到它会获得各种媒体的热烈追捧，并且入选《中华读书报》“2007年年度图书之100佳”。徐贲的《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成为《南方周末》“2008年年度图书（非虚构类）”，并且入选《新京报》“2008值得珍藏的20本书”，这也超出了作者本人的想象，启之在《记忆的理由》（《南方周末》2009年2月26日）里透露：“徐贲估计，此书只有几百个读者。”几年前，徐贲的《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就曾寂寞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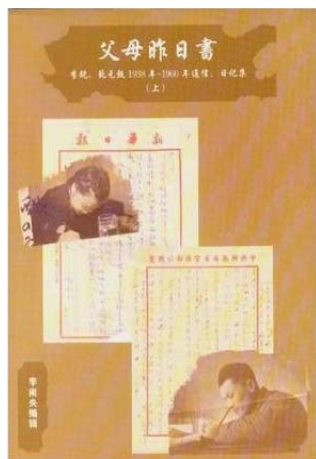
声。

从这种冷暖变化可以看出阅读风气的转换，毋庸讳言，书评在其中起到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作用。在目前的各种文体中，书评“性价比”最低，而且越认真，回报就越低。关于“书评经济学”，以后另外撰文讨论，此处按下不表。

新年伊始，杨奎松和徐贲分别推出新作《民国人物过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和《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新星出版社，2009年3月）。《民国人物过眼录》并非“新作”，杨奎松坦承“这个集子是硬编起来的”，是在丛书主编的再三推动下勉力为之。对这套“新史学”丛书，我最为期待的是李南央编注《父母昨日书——李锐、范元甄通信集（1938—1949）》（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笑蜀的《大地主刘文彩》和《苏联遗传学劫难》（均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感谢当年的水利部收缴了李锐和前妻范元甄的820多封信和部分日记，使得这些私人史料得以保存。李南央在《可信的珍贵史料》（《书屋》2008年12月）里提到，自己和丈夫一起整理了三部父亲李锐保存下的史料：八十余万字的《父母昨日书——李锐、范元甄1938年—1960年通信、日记集》（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二十余万字的《云天孤雁待春还——李锐1975—1979年家信集》（美国：溪流出版社，2007年），近九十万字的三册含1947年—1979年的《李锐日记》（美国：溪流出版社，2008年）。她表示，除了《云天孤雁待春还》中有一处在“父亲反复、强烈地要求下”做了一小段删节，其余部分坚持一个原则：一字不删、一字不改，哪怕有些文字会对父亲产生“负面”影响。这种态度，值得其他历史见证者的家属们学习。

《大地主刘文彩》和《苏联遗传学劫难》同样并非新作，前者曾经以《刘文彩真相》（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为题出版。刘文彩的水牢，存在于几代共和国儿童的记忆中，加深或者说奠定了我们对“万恶的旧社会”的理解。但是笑蜀通过研究发现其中很多纯属传说，水牢是“革命浪漫主义”的结果，刘文彩绝非十恶不赦，而是好恶参半。借用英国历史学者彼得·伯克《制造路易十四》（商务印书馆，2007年）的说法，这本书可以叫做《制造刘文彩》。与刘文彩同样著名的“周扒皮”的曾外孙孟令骞在《半夜鸡不叫》（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里，呈现了“制造周扒皮”的过程。健在的短工和长工，对“周扒皮”的回忆充满温情，几乎丧失了阶级立场。只有“半夜鸡叫”的创作者“文盲作家”高玉宝面对是否有“半夜鸡叫”的问题时，从容地表示“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假以时日，完全可以编辑一套“制造历史”丛书，一定不会缺乏选题。《苏联遗传学劫难》几年前以《背上十字架的科学：苏联遗传学劫难幻实》（当时作者署名陈敏，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为题出版，讲述了科学领域的“阶级斗争”，尤其值得理工学者一看，看看科学是否可以超然于极权主义之外。

李南央表示：“我们没有能力做更大的事情，但能这样为一个、两个、三个…甚至一群人提供些‘公民教育材料’，知



足了……”黄宗江在《巨著〈湘潭黎氏〉》（《文汇报读书周报》2009年3月13日）里讲到的亲身经历更加说明公民教育的重要性，他几年前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活动，问司机是否知道“四人帮”，司机回答“当然”，他问“哪四个”，司机回答“江青”，再问，司机回答“胡耀邦”。胡耀邦先生成了“四人帮”之一，不知道真理部的同志是否为此自豪？黄宗江还提到自己在文章里引用巴金的“只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常被京津沪各大报删去。编辑自律，可以理解，但是自律到让真理部的同志背黑锅，就有些居心叵测了。在集体失忆的情况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同时推出“口述历史”丛书和“回忆录”丛书值得关注，尤其在后者的待出书目里，可以看到《曹汝霖回忆录》和李璜的《学钝室回忆录》。对这两本书不多做介绍，等到它们出版之后再仔细道来，以免夜长梦多。

徐贲的《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一如既往地以“他山之玉”，攻“中国之石”。他拓宽了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空间，将全球正义、公共生活、公民认同、正义和社会之善、





公众新闻、承诺、信任、保护弱者、正派社会、博物馆、民族主义、物品秩序、收藏和怀旧、公民社会、公民治理一网打尽——这很对我的口味。正如徐贲所说，这是“我们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学者的问题”。

##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 HONGKON 香港

## 龙应台的 36 封家书

特约撰稿人 严飞(美国·旧金山, fei.yan@green.oxon.org)

说到家书，当代最有名气的莫过于艺术翻译家傅雷。在他一封封端秀的蝇头小楷中，傅雷给远在异邦深造音乐的傅聪写道：

“第一，我的确把你当作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手；第二，极想激出你青年人的感想，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间接传布给别的青年；第三，藉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章，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做面‘忠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在演奏姿态方面。”

这是傅雷不殚其烦，一笔笔、一行行、一封封坚持写家书的目的。那么，半个世纪后的全球文化评论者龙应台，面对 18 岁拥有德国血统的儿子安德烈，她写出这 36 封家书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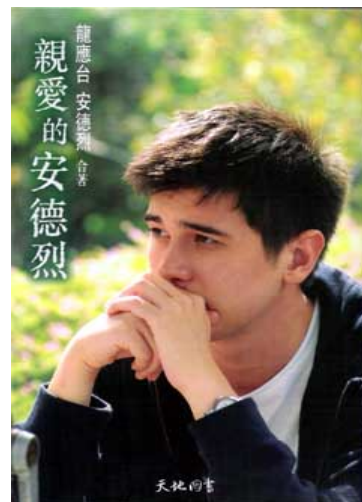
一切都得从三年前一次偶然的越洋电话开始。刚刚从台北文化局局长一职卸任的龙应台，当有时间将更多的精力投放进家庭生活中时，却发现自己已经完全不了解长大成人的儿子的内心世界。母与子之间的落差随着时间空间、世代隔阂乃至文化差异越拉越大。电话的一头，龙应台很想和远在德国的安德烈谈天，想要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在做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可是电话另一头却显得有点“冷”，“好啊”、“没问题”成了最简短最直白的回答。

这已经不再是写《野火集》的时代，曾经对专制与暴政猛烈批判、对自由和民主激情呐喊的龙应台，这一次面对的，却是开始沿着自己人生轨迹大步前进、充满着无穷困惑却不愿向母亲倾诉的儿子。在安德烈眼里，这是一个已经不再有任何“伟大”特征的失落时代，过往的经验已不合时宜，连想寻求一个叛逆的主题都不可得。每个人都在舒适、有教养的家庭长大，没有痛苦和灾难，也缺乏叛逆和冒险；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选择自己的品味，设定自己的对和错的标准。因此每个人都退缩成小小的个体，保守而平庸，不知该如何定义自我。

安德烈的焦虑来自对自身价值与未来前途的迷惘，而换到龙应台眼里，却多了一层母亲的焦虑。这份焦虑来自亲子关系，来自如何理解儿子的生命价值与人生定位，如何引导儿子对周遭所处的环境，文化、社会秩序甚至经济体系有自我的观察与体怀。

于是龙应台放下电话，拿起手中的笔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与儿子对谈，希望跨越世代与世代之间、国与国之间、生活与生活之间的差异，与安德烈重新建立起母子连结。正如龙应台在序言里所言：“我知道他爱我，但是，爱，不等于喜欢，爱，不等于认识。爱，其实是很多不喜欢、不认识、不沟通的借口。因为有爱，所以正常的沟通仿佛可以不必了。不，我不要掉进这个陷阱。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认识成熟的安德烈。我要认识这个人。我要认识这个十八岁的人。”

但是 18 岁的安德烈，每天都在不同的生活细节里考验着龙应台的思维，即便是在互通家书的过程中，两代人人生哲学的差异也被凸显出来：安德烈把写家书当做一件好玩的事情，只有五分的认真，却有三分的玩世不恭、二分的黑色幽默，经常就生活上的小事情提出一点细微的看法，而龙应台却把家书当做一件正而八经的事情，恨不能将自己所有的人生智慧、阅历和视野在儿子面前展开，并且被接受，被了解，甚至被承袭。





不过，作为母亲的龙应台也很冷静，一再告诫自己“他是个完整独立的个体”。母亲之爱并不必然等于要强迫儿子努力学习，为他划定人生道路，所以在书信里龙应台并不会为安德烈提供解决人生困扰的答案，而是注重培养儿子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给予他自我选择的权利。当安德烈 18 岁高中毕业，要离开自己朝夕相对的德国小镇而为离别忧愁时，龙应台回忆起自己的 18 岁，故乡因焚烧电线而乌烟瘴气的海滩、把女儿卖到外地的贫穷阿婆、骑车出门为孩子借学费而被火车撞死的乡下警察。这一切都内化成了龙应台日后面对权力的傲慢、欲望的嚣张和时代的虚假时的悲悯与关怀，并成为鼓励儿子



龙应台

子找寻人生终极关怀的生动事例；当安德烈决定以拒绝交作业的形式反叛没有道理的老师时，龙应台赞同他敢于为自己的价值信仰去挑战权威，但同时又担心尚显稚气的儿子学不会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崇高的理想主义者想要得到认可，就得在信仰和现实之间困难地找出一条自己的路来；当安德烈在周末和朋友酗酒大醉并告诉母亲，对于年轻人饮酒别过度紧张时，龙应台虽然掩饰不住自己的担心，但却告诉儿子自己所担心的并不是他“少年轻狂”时的玩乐，而是担心儿子在成人后是否依旧拥有追求自由的能力，因为人生的道路上充满着无数的荆棘。

3 年 36 封家书后，已经 21 岁的安德烈和已经过了“知天命”年龄的龙应台，看似两代人的隔膜依旧存在，但两代人都做了同等的去努力认识对方。亲爱的安德烈，“我们原来也可能在他十八岁那年，就像水上浮萍一样各自荡开，从此天涯淡泊，但是我们做了不同的尝试，我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他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信的内容谈论的是什么，也无论龙应台的笔法是否依旧“野火集”般宏大理性，我们都能从中体会到那种最原始的母爱，就好象母鸡奋力展开翅膀，欲将小鸡紧紧拥入怀中，给予安稳与温暖。

龙应台：《亲爱的安德烈》，香港天地图书，2007 年 11 月。

## ENGLAND 英格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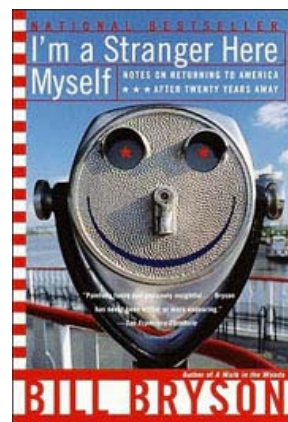
### 故乡的异乡人

特约撰稿人 孙晓骥（北京，[seismometer2006@yahoo.com.cn](mailto:seismometer2006@yahoo.com.cn)）

最初知道比尔·布莱森（Bill Bryson）这个名字还是在《华盛顿邮报》的一个专访里。当时正值英国反对美国伊拉克战争的高潮期，《华邮》特地采访了一组在英居住经年的知名美国人士，布莱森便是其中之一。此采访消弭美英间政治罅隙的意图不言而喻，我当时也不禁为这位老兄捏把汗：替美国说了这许多好话，书在英国还如何卖得动？

后来陆续读了布莱森的一些文章和书，方知他其实对自己的祖国“意见”也不少。就拿手边这本《人在故乡为异客》（I'm a Stranger Here Myself）来说，作者开篇就抱怨从英国回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后诸多琐事的不适应：“买点小东西却乱给小费，代理在自动取款机、自助加油机和付费电话前不知所措，而且当你的手臂被人猛然抓住时，才惊讶地发现加油站的地图再也不是免费的了。”

美国，在布莱森的笔下俨然由“故乡”变为了“异乡”。虽然都是英语国家，但英美两国在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的差异还是让布莱森觉得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不过，以幽默见长的他并没有转而攻击起美国文化，而是“享受”这种差异，寻求其间的意味和这种差异背后的原因。就专栏文章对此所能具有的深度而言，布莱森已将这种文体发挥到了极致。



久居英伦的人似乎难免对美国有些许诟病之词。1842 年，游历美国的狄更斯乘船沿俄亥俄河往西南而行时，看见河岸的洼地，便说出“丑恶的坟地，疾病的温床”之恶语，只因不少英国商人被骗至此投资。同一时期曾著有《美国人的风俗习惯》的弗朗西斯·特罗洛普也嘲讽道，美国人一面口称自由民主，一面却压迫黑奴、屠杀印第安土著，其行为几近虚伪。

布莱森自 1973 年踏上英格兰土地以来，为《泰晤士报》、《独立报》等媒体撰写文章凡 22 年，直到子女即将就读大学之际才举家搬回美国的新罕布尔州，其思维难免不受英国文人对美国观念的影响，对美国人过分依赖自驾车、整日充斥着无聊广告和垃圾食品的生活极尽嘲笑之能事。同时，作为旅行作家的布莱森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本身又是颇精藻鉴之人，自然也不会将自身视域囿于传统的窠臼。



例如，作者在书中一面批评说美国的高等教育不及英国严谨，尤其是公立学校教育不发达，同时，他也看到，像英国牛津剑桥大学这样的所谓“公立学校”却并不对学校之外的公众开放。相反，倒是美国的私立大学，例如他所居小镇的达特茅斯学院，则会将运动场、艺术馆、咖啡厅等学校设施免费向大众开放，布莱森认为这是美国人际关系沟通比英国更为“顺畅”的一个缩影。不过，他也看到这看似融洽的人际关系，无非是美国人日常的一种“条件反射”，而从统计数据上看，美国仍是最仇视外来移民、最早使用监视器摄像头的国家。

布莱森还注意到美国的另一种“虚伪”，一种数据上的、经济学的虚伪，他注意到美国人对于专业术语以及统计数据的迷恋。当初他选择在新罕布尔州居住，就是因为阅读了《美国数据摘要》中对该州犯罪率的统计。同时，他也认为充斥在广告、杂志上的各种表格数据似乎太过泛滥了一些，弄得人人都不得不像一位经济学者般思考。一次路过纽约第六大道时，布莱森注意到矗立于此的电子“国债钟”，上面不断刷新的数字让他有所顿悟：四点五兆美元的庞大金额让在此驻足观看的人不由得产生出一种莫名的快感，一种美国梦般的用来顶礼膜拜的幻象。可是，他紧接着问：对一个普通人而言，“四点五兆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连他自己也无法回答。不过，面对儿女读大学开支的账单时，布莱森却真实地感受到了数据的“力量”——不是两万美元一年的学费，而是另一种数据——岁月在人生中留下的刻度。他曾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仔细计算过所写每本书、每一篇文章的成本与收益。但当他的儿女们纷纷上大学离家之后，面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布莱森猛然意识到，时间的流逝往往“来得比你想象中要快”，不会有别的什么会比与家人在一起的“收益”更高。于是，他决定动身返回故里，来到汉诺威小镇，成为了一个生活在故乡的异乡人。

比尔·布莱森：《人在故乡为异客——二十年后返乡手记》，夏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年 1 月。

## BOOK REVIEW 书评

### “高陶事件<sup>1</sup>”旧话重提，盖棺之论尚待时日

特约撰稿人 刘柠（北京，postdadaist@gmail.com）

今年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以“百科史学·回忆录丛书”的形式，推出了《高宗武回忆录》和陶希圣的回忆录《潮流与点滴》。后者为大陆初次正式出版的简体字版，而前者则是传说中的神秘文档尘封 65 年之后的首度付梓面世。因两位作者的特殊身份和传奇经历而引发的读书界的话题效应，不仅导致大众传媒对历史上“高陶事件”的旧话重提，而且会与大陆史学、日本研究学界的反应发生某种互动，从而出现对事件及其当事人重新检讨、重新评价，乃至做“盖棺”之论的学术性诉求。

<sup>1</sup>1940 年 1 月 3 日，曾参与汪伪集团对日“和平”交涉的高宗武、陶希圣二人在杜月笙的周密策划下，秘密逃离上海，两天后抵香港，就此彻底脱离汪伪集团。1 月 22 日，香港《大公报》以头条全文披露了由高秘密照像并携带出逃的汪伪集团与日本政府秘密签定的卖国条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内容，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阴谋和侵略野心，举世震惊，构成了抗日战争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事件。

“高陶事件”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一桩震惊中外的悬念迭出、惊心动魄，然而却始终云遮雾罩的历史悬案，虽然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古稀的漫长岁月，曲早已终，人散亦久（陶、高二人分别于1988年6月和1994年9月辞世），但迷雾仍未尽消；尤其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真相远未呈露。因此，对事件全貌的“揭秘”仍嫌为时尚早。就笔者自身而言，通读二著，尤其是期待已久的高著之后的感觉，毋宁说是失望大于惊喜，困惑大于收获。

但是，鉴于围绕此事件的有关当事者的第一手回忆资料（包括战后被治罪的前汪伪要员的交代材料），中国人的，日本人的，以高著问世为界，该出来的，基本上都已经出来；没出来的，将很难再出来，也许永远也出不来了的事实，应该说，尽管水面下不可见的冰山依然巨大，客观上，却似乎到了盘点历史库存的节点。

## 版本问题

关于陶著《潮流与点滴》，问题不大。纵然不无繁体字版与简体字版的全（本）节（本）之别，但即使是大陆简体字版亦系本着1964年台湾传记文学社出版的繁体版编辑而成，内容上，特别是与“高陶事件”相关的章节应无大别。但关于高著，则需做具体说明。

此番出版的《高宗武回忆录》，系由美籍华人学者陶恒生（陶希圣之子），根据存放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馆藏于美已故外交官劳伦斯·索尔兹伯里（Laurence Salisbury）<sup>2</sup>档案中的高氏英文打字稿逐译而成，原稿标题为《深入虎穴》（Into the Tiger's Den），为索氏在高氏原稿基础上的润色、编辑稿，完成于1944年8月31日，刚好是日本投降前一年，汪精卫于两个月后病歿于日本名古屋。出版前，曾于台湾《传记文学》上连载；译者陶恒生也曾在《书屋》杂志上撰文<sup>3</sup>介绍，并一度列入《书屋》的出版计划。

但2004年3月，高氏夫人沈惟瑜去世后，高门后人在整理高氏夫妇遗物时，发现除了英文手稿外，还有一份中文初稿《日本真相》，约15万字，“内容比英文稿更为翔实丰富”。对中文手稿的存在，高氏夫妇生前从未与任何人谈及，更未示人，始终珍藏于府内。既发现了内容“更为翔实丰富”的中文手稿，译者陶恒生出于“尊重高府后人的意见”，中止了已与《书屋》达成的出版计划。而《书屋》则转而把中文手稿纳入出版计划（“书屋文丛”），并于2007年分两期<sup>4</sup>选载了由夏侯叙五整理、注释的高氏手稿的部分章节。

笔者原先以为此番付梓的中文版系根据高氏中文手稿《日本真相》编辑而成的产物，不禁大喜过望，没想到却被辗转“掉包”，又回到了起先英文翻译稿的轨道，且出版社似乎也几度调整。如此繁复的出版背后的秘辛，微妙地诠释了事件本身的敏感——70载的岁月都未能“脱敏”。

高氏回忆录之存在与否及出版的问题，历来是史学、日本问题学界关注的热点。其英文稿的出版事宜，早在二战尚未结束时就曾得到过胡适等人的襄助，惜终未实现。此番在大陆出版，诚为可喜可贺之事。但同时，为学术研究计，无论有多么复杂的“背景”，被认为内容“更为翔实丰富”的中文手稿的出版实应提上议事日程。这也几乎是可望揭秘“高陶事件”的最后的重要线索之一。

## 真相远未浮出水面

由于当事者在历史事件中的立场主张、扮演的角色及回忆录的写作时间不同，高、陶二人在各自著作中对那场被日本及其傀儡集团称为“和平运动”（在我国现代史上一概称为日本诱降汪精卫事件）的历史迷误的分寸把握也不尽相同：陶著简约，对事件本身的回忆和出逃过程的描述加起来，才占两章篇幅（约30页）；而高著则以全书近半（近百页）的篇幅，对事件展开了全景式“复原”。由此亦可看出“高陶事件”的主导者是高，而不是陶。岂止“高陶事件”，就整个“和平运



<sup>2</sup>Laurence Salisbury (1891-1976): 1941-1944 年，任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部助理主任；1944-1948 年，任太平洋关系研究所美国委员会《远东观察》（Far Eastern Survey）杂志主编。

<sup>3</sup>见《书屋》2007 年 4 月号《高宗武英文回忆录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回顾》文。

<sup>4</sup>见《书屋》2007 年 7 月号、10 月号。



动”而言，高也堪称始作俑者。学者止庵甚至认为，没有高宗武，根本就不会有汪精卫出走河内的一幕，当然也就不会有后来发生的一切。

高宗武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这个早年赴日留学，曾先后就读于九州帝大和东京帝大，“日语说得跟日本人一样”的精明瘦弱、长于辞令的浙江青年，放弃了在言论界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和做教授的坦途，以日本问题专家的身份进入外交部。因备受国府主席蒋介石和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的赏识，三年间，不次拔擢，1935年出任亚洲司司长时尚不足而立。可尽管如此，即使在抗战初期，在由政学两界名流组成、四处弥漫着“和比战难”的空气所谓“低调俱乐部”里，高亦是核心般的存在。甚至这个松散的精英派系之来历，也与高不无干系。美国历史学者、《和平阴谋——汪精卫和中国抗战（1937-1941）》一书作者邦克（Gerald E. Bunker）在著作中谈到胡适从庐山牯岭回到南京后时说：

胡适在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陪同下，至高宗武家午餐，在座的有高的朋友和同事萧同兹、程沧波。胡向高寒暄：“高先生有何高见？”高答曰：“我的姓虽然‘高’，但我的意见却很‘低’。”从此，几个主张以外交解决中日问题之人的住所，得了个“低调俱乐部”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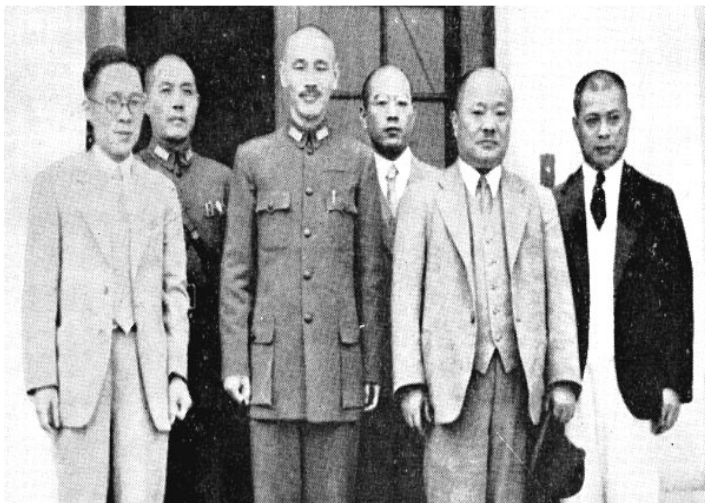
如果联系到后来高在“和平运动”中折冲樽俎，在南京、上海、香港、东京间数度穿梭，以一人之力调动、运作中日两国政要人，穿针引线，斡旋和平的情况，更不得不感佩其“人小鬼大”。但惟其如此，能者多劳，外交部时期的高宗武，深得蒋介石信用，每每被委以重任。1935年11月，汪精卫在南京遇刺受伤，辞去本兼各职，赴欧洲疗养。蒋介石亲自接任行政院长，同时电招湖北省主席、国民党著名的“知日派”元老张群接任外交部长。张主持外交大计，对日具体交涉则全权委托高，并嘱其对日重要交涉案件可直接向蒋介石面陈或请示。一次张群接听电话，是蒋介石打来的，他开口就说“我找高宗武……”。难怪后来汪伪在南京召开伪国民党六中全会时，汪精卫觉得高宗武的态度可疑，对高说：“……我真的不懂你。问题是你亲重庆，蒋介石不放弃你，你也忘不了他。”

但高宗武深知，在深蒙高层信任的背后，是大战前夜对日外交的棘手、危险和高官们避之唯恐不及的现实。一种失望、无奈，多少有些虚无的情绪在回忆录中多有流露：

这段时间，与日本人打交道的中国官员处境危险。汪精卫吃了一枚假扮摄影记者的中国人三颗子弹。他康复后脊椎骨里还卡着一颗弹头，直到十年后才被他的日本主人取出。汪被枪击后不久，外交部次长唐有壬被人用左轮枪暗杀。

日本大使馆秘书曾经劝我辞去外交部的工作，他说：“对日交涉的中国官员，不管他多么能干，多么苦干，都不会有好结果的。”……我自己也厌倦透了。我向外交部请假，事实上我想辞职，可是张将军告诉我他即将辞职。所有中国人都避免和日本人接触。张将军坦诚地告诉我，所有他的朋友都劝他把接触日本人的事留给我。曾经跟日本人打过交道的中国官员，不管他们多么爱国，风险都非常大，下场都很不好。

不过，“高陶事件”发生后被蒋介石赞为“浙中健者”的高宗武“芯”很强，硬挺着，办了多起极其艰苦的交涉，其间更见识了日人的霸气、骄横，内心的倦怠感越发强烈。但直到1938年初，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并宣布德国大使陶德曼的居中调停破裂之后，2月从外交部辞职南下赴港，其实也是奉蒋之命。据说，行前蒋对高说：“你自己斟酌决定吧，尽力而为。”照后来曾在美国多次访问过高的美籍华裔历史学者唐德刚转述，高对唐说，当年蒋对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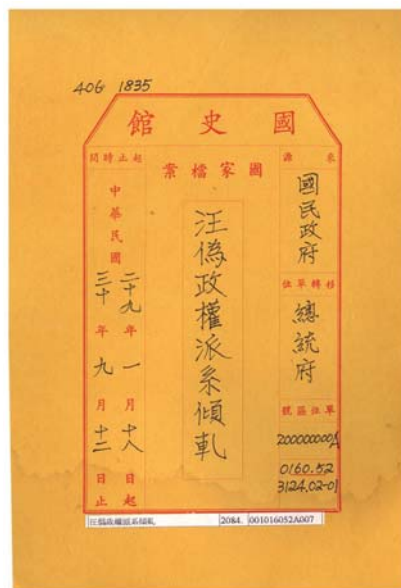
左起为高宗武、钱大均、蒋介石、今井武夫、喜多誠一、雨宫巽

1936年6月13日、南京陵园孔祥熙别墅

说的这句话十分精明，如果高干了什么（使中日关系）转向正常的事情，蒋将给与充分的信任，否则，那将由高自己负责<sup>5</sup>。在香港，以军事委员会官员的身份，以“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下属的“日本问题研究所”的名义，“实际则代蒋氏负担对日联络与觅取情况的工作”<sup>6</sup>，其活动经费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列支领取（据《周佛海日记》记载，每月两千元）。

这说明直到此时点，蒋介石都未放弃外交努力。同时，由汪精卫主导的对日“和平运动”则在水面下同步推动。而在实际的推动者当中，高无疑是最重要的存在。事实上，作为亲自参与了“和平运动”初期一系列核心交涉，惟一精通日语、对日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了如指掌、并在日本政军财界有广泛人脉的高宗武，被日本方面视为联络汪精卫集团的重要秘密管道。不仅如此，一些先期加入对日秘密交涉、后成为汪左近的亲信死党的分子，也是高举荐的结果（如梅思平、周佛海等）。

在高的回忆录中，对汪精卫飞往河内以降的过程，均有详尽的描述，但对两个重要活动却全无交代或语焉不详：一是1938年7月，他从香港经上海秘密去了趟日本，在东京会见了包括首相近卫文磨、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内阁参议松冈洋右、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在内的敌国军政要员；二是同年11月，他与梅思平在上海与日本军方代表今井武夫、影佐祯昭签署了一份《日华协议记录》（即所谓《重光堂协议》）。回忆录对前者只字未提，对后者仅以一句话（“犹如在昏暗中摸索，汪精卫跟日本人订立了出走安南的协议。”）一笔带过。而前者，高从日本回港后，派人将访日报告并一函（“倘有可能以供均座参考之处，则或可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云云）呈送蒋介石，蒋大怒：“高宗武是个混蛋，谁叫他去日本的？”随即叫停了高在港的活动经费（等于撤销了高的官方职务），使高深受刺激，以至旧疾复发，咯血病倒。而后者，则为后来汪日谈判的原始蓝本，他们还制定了一套汪精卫出走河内的行动方案。而此时，汪精卫远未决定“下水”。据陶希圣在《潮流与点滴》中透露：高致蒋的报告先经周佛海递至汪处。汪看到报告中提到日参谋本部希望汪出面言和的一段，不禁大惊。对陶说：“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绝不瞒过蒋先生。”



对此，高著译者陶恒生也认为：“这不是美中不足，而是大有可议的缺陷。”尤其是前者，即使以高从外交部辞职前的最高职衔（亚洲司司长），赴日办如此重大的交涉，在外交上也很难说“对等”；何况，从蒋的发怒看，蒋对高的擅自出访确不知情。因此很难从职务行为的角度来理解高的行动。但如果不是“职务行为”的话，那高的动机到底何在呢？也许正因此，原汪伪集团中的另一名宣传大员、周佛海的盟友金雄白（笔名朱子家）持论说：“……他（指高宗武）最后的改变目标而抬出汪先生来，则以日本两度关闭了对蒋先生和谈之门，或许是在失败中想死里逃生，也或许他暗中奉到了别一项的使命……”<sup>7</sup>权聊备一说。

后来发生的直至脱离汪组织的“高陶事件”的过程及其后高陶二人各自的人生命运，已见诸包括当事者在内的各种回忆资料，轨迹基本上是清晰的。疑点主要集中在这一段。而如此谜团，不仅并未因高著的面世而消失，反而有种更加惶惑的感觉。所以，笔者以为，还远不到对“高陶事件”做盖棺之论的时候。

### 作为日本论的高著

高著的写作完成于日本投降前一年（中文手稿于1943年2月脱稿）。其后至少一年的时间，或许不无生计方面的考虑，高宗武一直致力于著作在美国的出版，虽经两任驻美大使胡适和魏道明及曾当过蒋介石顾问的美著名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等实力派学者从中斡旋，并尝试多家出版机构，终未果。有些出版社则直接对高的身份提出了质疑。笔者认为，高著作之所以无法在美出版，除了高后人所说的诸多商业性、事务性因素之外，与彼时太平洋战争后期的国际形势不无关系。换句话说，未必不是美出版商基于针对“敌性国家”的政治正确性方面的考量而搁置了出版。

但有所得必有所失。事实证明，美出版商的政治判断错过了一本鞭辟入里、难得一遇的日本论。而彼时，美国正面临

<sup>5</sup>转引自范泓《隔代的声音——历史劲流中的知识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30页。

<sup>6</sup>据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香港春秋杂志社，1965年8月版）第5册，第8页。

<sup>7</sup>据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香港春秋杂志社，1965年8月版）第5册，第109页。

如何进行战后对日占领及改造日本战略课题，此前美主流社会的“日本性恶论”式的传统意识形态思维已难行得通。大约同一时期，由美军方资助、美本土学者执笔的以在美日裔为对象的、关于日本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学术调查项目已开始实施（其报告书即 1946 年公开出版的《菊与刀》）。

高著以共九章逾百页的篇幅，就九一八事变后“少壮军人”集团的崛起、七七事变后内阁的频繁更迭等现象及其背后的社会机理，对法西斯军国主义及支撑其对亚洲的战略野心的“大亚细亚主义”及其背后的发生机制等问题，均作了深度剖析。因作者对岛国的深刻体察，很多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亦不过时，有些则令人拍案叫绝：譬如对日本的谎言政治、军人的“流泪武器”，对那种一介陆军军务课长动辄决策政府政策，甚至草拟组阁名单的不可思议的非程序化政治运作机制的解读，等等。更重要的，作者不是以学术的身份立场做理论分析，而是以自身的所见所闻所感在谈论日本；所谈论的对象上至实力派军官、财阀、政治家，下至普通商贾、官僚，多为作者实际见面、接触之人，其视角、观点颇为“内部”，堪称稀罕。

如此弥足珍贵的日本论，未能于更早时间问世，实乃学界之憾。不仅对中国，即使对日本和美国来说亦莫不如此。

高宗武：《高宗武回忆录》，陶恒生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年 1 月第 1 版。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年 1 月第 1 版。

## BOOK REVIEW 书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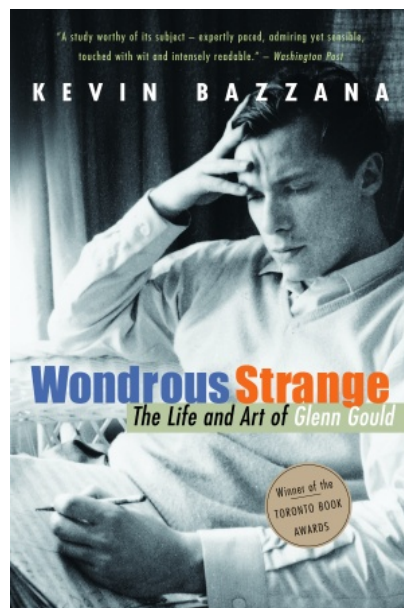
### 给神话消毒,还怪异真实

特约撰稿人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huiyuanma@gmail.com）

一向不鼓励自己和朋友看“名人传记”，尤其是演奏家传记，因为不喜欢把“轶事”的心理暗示代入到倾听中。但因为对音乐好奇而要了解一下音乐家的生活，确是人之常情。毕竟音乐是人演奏的，时风、演奏流派、录音公司的兴衰都与音乐有关。我有一个理论，就是传记如果非读不可，就要尽量多读，让彼此矛盾、各执一词的说法形成一个“互相消毒”的结果。这样的话，你不仅了解了“传主”，也能分辨出传记的好坏。而好传记是一个好的“透镜”，读者面对和名人相映的世道，读了人也读了历史。

作为一个几乎翻阅过所有古尔德传记的读者，我也许有点资格推荐一本“最好”的传记——《不可思议的惊奇——古尔德的生活和艺术》（Wonderous Strange—The Life and Art of Glenn Gould）。一般地讲，GG 神话主要包括：32 岁于舞台巅峰期退隐，然后只录音不露面，生活如苦修教徒一样孤寂；一辈子主要弹巴赫、勋伯格，而且演奏风格极其离经叛道，把文雅的巴赫演绎得遍地棱角。电影《古尔德的 32 部生活短片》将这些神话片段夸张和固化了，其中有 GG（演员所扮）把胳膊伸进温水中浸泡的巨大特写。其实那是 GG 传记里最糟糕的一个。说是糟糕也不算太公平，因为其中的内容是事实，只是过于简化而已，好比漫画形象刻意突出最有广告效应的部分。如果我们企图接近“真实”，就要了解和分析夸张形象的缘由和背景——结果往往是，神话消失了，天才的种种怪癖，背后都有相当“正常”、“合理”的解释。

这本传记就好在，虽然也有作者个人的“诠释”和偏见，但总的来说是给常见的神话消毒，也提出了很多音乐上的见解。作者从加拿大多伦多的背景讲起，提供了一个关于 GG 的“上下文”。1932 年，GG 降生于多伦多市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这在当时萧条的加拿大（全国人口只有一千万，而面积比整个欧洲都大）是很大的幸运。GG 从幼年就表现出突出的音乐天赋，而平和、明智的父母尽自己所能让他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童年。父母每年为他学音乐支付三千加元，据说这笔钱可以养活邻居一家七口。“总的来说，他是幸运的。一个平安、快乐的童年和





一双无私、爱护孩子的父母可以毁掉一个艺术家（没有什么事情比对家族的羞耻或者对父母的恨更能滋养艺术家的创造力）。”巴扎纳这样说，也许有点偏颇，但确有大量艺术家的生活为实证。不过，GG 的生活道路却并非如此，他少年得意又被过度保护，成年后仍然个性突出，坚决不向别人的意见妥协。这当然主要是在音乐方面。在生活上，他虽然我行我素，但“自我”的力量主要体现在自恋、自我中心上，对他人从无进攻性。他对浪漫主义音乐虽然痛诋不休，对演奏这类音乐的同行倒是赞扬居多。

GG 的孤独性格也和生活环境有关。父母都是虔诚的教徒，勤劳守法而偏于禁欲，“家人从来不提及和性有关的话题。”而 GG 的孤独，其实是当时多伦多附近保守家庭的普遍风气——那里的男人安静、沉默、害羞、喜欢稳定的小圈子生活。这些特点在 GG 身上发展到夸张的程度。GG 是家居动物一只，也是典型的“多伦多男孩”，一辈子不高兴旅行，犹如巴赫。但也许和巴赫不同的是，他神经过敏，害怕感冒、细菌和身体接触，所以视旅行为灾难。不仅如此，他似乎暗暗以享乐为耻，不仅轻视钱，住好房子、吃好东西都有罪恶感。跟同级别钢琴家相比，他收入算比较少的，五十年代热卖之《歌德堡变奏曲》录音只挣了一千四百多美元。他为录音投入的成本常常高于收入。而如果上台演出的话，收入当然高很多倍。而他曾经天真地试图劝说别的音乐会钢琴家退出舞台演出，因为“当众表演是肤浅的，损害音乐精神。”

本书的主要篇幅用在 GG 的生活和背景上（比如《艺术家的肖像》一章，全面地讲述了他的人格和生活习惯，包括对北方和严寒的热爱），对音乐也有非常中肯的意见。其实，GG 的成功本身，也是个演绎“造神运动”的过程。论者若想在强大声誉的面前提出有力而合理的意见，必须拥有足够的“内力”。照巴扎纳的意思，GG 和霍洛维茨有些相似，主要在于“创造性地说谎”（creative lying）这方面。演奏，到底是展现创造力的领域吗？对这两人的演奏，评论家一直有分裂的意见。另一位钢琴大师希夫就表示，反对把展现个性当作终极目标的演奏家。



GG 的巴赫处处离经叛道，虽然引来众多非议，在竞争极为激烈的钢琴界，他牢牢地占住了自己的位置，并且赢得了同行的尊敬。本书作者对此也有许多针对具体录音的讨论。从现有资料（GG 访谈、日记等等），GG 的意图大概是，倾听应该和思考同时进行，而非沉浸在“感官之美”中。在理想情况下，听众好比他的同行，随时能记住细节，又能把握整体。演奏是一种和作曲家针锋相对的“戏仿”，而倾听成为双方参与的对话。事实上，GG 所期待的效果大概很难出现。他的演奏由于难以被吸收和理解但又往往自圆其说，好比一种难溶解的物质，每次只能融化 1%，所以总有一种魔力吸引大家去思考。这样强劲的挑战给古典音乐世界注入了巨大的活力。

多数人说起 GG，总把他的“怪”放在第一位。而在笔者看来，他的“好”是第一的，其次才是“怪”，“怪”是“好”的一部分，但两者并不等同。世上并非只有 GG 标新立异——企图弹得让人记住或者已经弹得稀奇古怪的人并不少，但极少

有人取得稳固的话语权。巴扎纳的另一本传记，《消失的天才》一书中的主人公 Erwin Nyiregyhazi，据说在刻意变化、强调织体上比 GG 有过之无不及，其人据说也是真天才，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像 GG 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中，加上运气不佳，虽然出了录音，但未成大器。此外，古典音乐的演奏并不是越独特越好，也不是越怪越好，这在 GG 身上一样适用。音乐要在微妙的处理中获得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平衡，而非简单地以“有没有个性”来区分高下。本来，“个性”也只是演奏中的一部分因素。所以，尽管有了 GG 的“个性表达”，我们仍然需要图雷克、希夫、普莱亚等相对中庸并贴近巴赫原意的演奏。

在笔者眼中，GG 作为一个现象，给我们定义了一个演奏巴赫能达到的边界，这当然是一个综合效果，也就是说，坚实、清晰之外，他按自己的观念替巴赫创作出高潮，当然也压抑和消解了很多东西，比如由连线自然牵引而形成的本能的歌唱感。这样做，无论在音乐上还是对演奏家的职业生涯来讲，都是危险的。而 GG 我行我素地一再录制巴赫，以终生的解释说服大家接受了他的巴赫。

在 GG 的种种录音中，巴扎纳给 1977 年录制的巴赫《英国组曲》以极高的评价。用他的话说，GG 的演奏从未如此既

亲切、独到又内省，体现了现代精神和浪漫灵魂的完美结合。我相信巴扎纳的评价，但也忍不住推荐一些“几乎一样好”的录音，比如 1981 年的《哥德堡变奏曲》和《赋格的艺术》——管风琴的部分，在行内人士听来是有点荒唐的，不过那近于“收缩”的声音形态，似乎刻意造成空旷之感，把冥想和幻觉留给来生。

读毕本书，作者苦心的采访和梳理令我瞠目。他清晰、细致的描述谦卑而分明地展现了他自己的才华和不凡的音乐素养。作者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能对 GG 有这样持久的耐心，并且在 GG 已经被“过度传记”的情况下，鼓勇写这样一本浩繁之书呢？搜索一下关于作者的资料，原来他拥有伯克莱大学的音乐史博士学位，老师还是著名音乐学家 Richard Taruskin，但他现在没有教职，甚至没有稳定的工作，靠编辑和自由写作为生。对 GG 他用心研究了近 20 年，对关于 GG 的种种事实了如指掌，有问必答，当然是出于兴趣——在加国，以写作发财甚至谋生，都是不现实的想法。本书获了奖也让他出了名，但折算起来，他的报酬比“最低小时工资”还要低得多。这样说来，多年来无名、艰辛地工作着的巴扎纳，有着和 GG 类似的定力，也许是因为深受其人其乐感染的缘故。本书给我的印象尽管是“消解神话”，但不得不承认，能够被消解的只是肤浅的概念化形象，而 GG 对音乐的敏锐表达，仍然难于分析、分享和仿制；世上有些坚硬的“结晶”，从艺术天才到沉潜之力，其实是他人无法消解甚至理解的——文明的核心往往凝结于此。

Kevin Bazzana: 《Wondrous Strange: The Life and Art of Glenn Goul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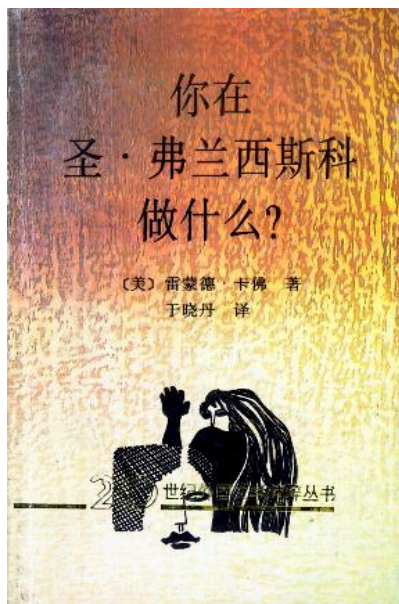
## BOOK REVIEW 书评

### 卡佛的书

特约撰稿人 朱白（广州，[zhubai@tom.com](mailto:zhubai@tom.com)）

卡佛的书，就像一位传说了很久的美女，终于盛装驾到。按照常规，这一次也是姗姗来迟。

只有少数人才看过 1992 年花城出版社的那本《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大多数人只能待在在阵阵传说中不停地慕名这位惊世美人，当然，实在熬不住了，也可以在诸如“寻找雷蒙德·卡佛”这样的网站上略微满足一下，对于忠于纸感墨香的人来说虽非原滋原味，但也算领教一下卡佛之好到底好在哪里了。所以说，那些传说中，既有那些少数人得天独厚的早年阅读，更多的是互联网上免费翻译、免费阅读的同仁间互助。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仿佛一下子冒出来很多喜欢卡佛的人，这里面大多为传说，因为我知道在人数上真正看过的人肯定小于谈论卡佛的人。即便每一个声称是卡佛粉丝的人都看过卡佛的书，那也没什么，对于卡佛来说，他身后的那些读者没有影响到他的生活，更谈不上让他活得更舒服。换句话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讲，他的读者也许并不存在，他既不用对之负责，也不会享受到额外的恩惠，生活的任何残酷只能自己承担，从这个角度来讲，作家和其他工作没有区别，每个人承受的首先是他自己。读者也一样，他喜欢首先的是他自己。就像卡佛笔下的那些不得志又不得不活下去的主人公，他们都是卡佛某种处境的化身，他们承担着自己的生活，对之外的毫无办法，其他人也无法真的改变这种让人不安的生活，亲人之亲、朋友之情，都会显得轻薄，无能为力。当我们面对自己琐碎的生活，很多时候除了两手摊开，难道还真有什么解决之道吗？有了承受这回事，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卡佛的小说并不是消极，承受就意味着不放弃，不管是苟延残喘，还是如鱼得水，都是活下去的一种方式，他们的终极结果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从文学的角度来谈论卡佛，可以说卡佛用他极短、极简的形式完成了对文学的最高级表达。文学有高级、低级之分？当然有，我认为汪国真、金庸就属于低级，当然首先你要先放低标准，承认码字就是文学。卡佛在批评家那里有极简主义（Minimalism）的鼻祖之称，不是简约的形式就赢得了读者，而是卡佛的故事、情节、人物，这些内容上东西，完全无缝隙地对应上了这种形式。也就是说，

在卡佛那里，极简主义这东西达到了形神统一。我觉得，这正是卡佛迷人的原因之一——这是艺术之所以能够产生魅力的原因，是审美的一种印证。读卡佛，就像当年梅兰芳在美国能够得到认同是一个道理，它是一种审美，卡佛的诸多短篇正是这美的一种。

卡佛的语言松散而有力，所以卡佛从来不单一描写情绪，而是用一个主要故事（所谓主要故事，也不过是琐碎的生活、庸凡的小事）来统领这篇故事，然后顺其自然地交代出围绕这个主要故事的人以及他们的事，既是烘托这个主要故事之“小”，也是继续扩大了整篇小说的“小”。我相信作为作者，卡佛对他的小说有过花费力气的雕琢，这样复杂的工序正是这种简约风格形成的关键。所以，我们很多人搞错了，以为放松的小说就是要散漫松垮地写，沉重的小说就得泪流满面仰天长叹。看看我们的作品多低级，就知道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有多低级。还有很多作家为了逃避责任和必要程序，就在工序上搞豆腐渣，明明是偷懒，还说自己是在路上，那些制造简单轻薄垃圾的人有没有想过，如果自己是读者会有兴趣多看那些垃圾第二眼吗？没人需要再来一个凯鲁亚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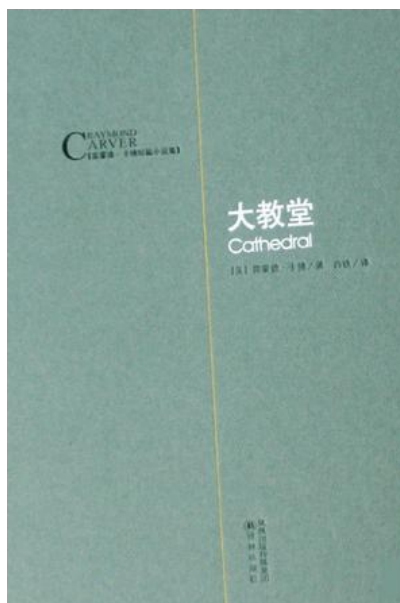
回到卡佛的小说，他用恰当的形式完成了对本真生活的完美叙述，如果你是卡佛小说之外的人，有必要真诚理解一下这个地球上跟你同为人类的其他人的生活，他们存在，正如你的存在；如果你是卡佛小说的某个主人公，那么不需要准备了，可以马上得到帮助——卡佛将告诉你一个深陷平庸琐碎不安生活之中又不至于被它打到的实践经验。

在《羽毛》中，杰克夫妇拜访巴德一家，前者在巴德家中遇到了各种不适应，但都是小问题，他们仿佛在激动中等待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小孩的到来，在等待的过程中，卡佛带领他的读者一同经历一个普通家庭的几件琐碎小事，比如杰克老婆奥拉的假牙，它们起先是如何的丑陋，后来又是如何经过动员装在奥拉的嘴巴里。等着看巴德的孩子，好像成了杰克夫妇要做的一件事，如同我们生活中任何一对夫妇一样。此时，小说家本人用一种类似的情绪，将笔下的人物赋予了一种我们很难发现的激情，比如对生活中某个不经意的片断，正是让人物内心燃起火苗的种子。

在《瑟夫的房子》中，一对刚刚恢复情侣关系但却要准备搬家的男女，刚刚妥当的生活又要面临溃散，看似稳当、幸福的生活又要离他们而去，也许生活还会重新开始，但是给他们带来无比温馨的海和海边的浪漫房子，肯定不见了，这对于一对敏感的男女来说，可能就此什么都没了。而卡佛的主人公说：“那就是结束了吧。”生活总有这样的一天，当挣扎、逃避、努力、敷衍、放弃、奋斗、妥协、随遇而安……之后，你的生活早晚有这么一天，一切结束，此时什么都不用你再做了。

小说集中的压轴之作《大教堂》，被成为卡佛的成熟之作，我倒是觉得这种成熟让卡佛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即用刻意的方式来抒发刻意的情绪。但是除此之外，也得承认卡佛似乎真的通过这部作品让人找到了理解并阐释卡佛作品的方向，所以可以说它使他成功了，尽管并不那么卡佛。台湾翻译家张定绮（刚出版不久的约翰·欧文的两部杰作的译者）说：“写出这样慈悲而宽大为怀的故事，为人类的困境指点一条出路，代表卡佛终于进入大师的门坎。”——这种说法真够势利，但也很真实，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如此，轮不到任何人超越。

小说集《大教堂》的出版应该说满足许多人的幻想，它既是热爱的延续或者开始，相信也会成为抛弃的理由。我不相信真有那么多人需要卡佛，跟前面煽情的推荐相反的是，我也有足够的理由说大家不用都来读卡佛，作为生活之外似乎可有可无的文学，它并不属于必要。不需要、不喜欢卡佛和需要、热爱一样充满道理。距离卡佛出版这部小说集的时间已经过去 25 年，这四分之一世纪没有因为卡佛的小说有过任何改变。从这个角度来说，卡佛的极简主义小说也是奢侈品。





## IMAGE 影像

### 影像作為視見與被見的中介

特约撰稿人 肥内 (台北, [puresice@gmail.com](mailto:puresice@gmail.com))

“(歌德)认为眼睛把光线输送到大脑,而这项人体内部的活动也决定观看的内涵…”(页1)

影像作为时间的产物,不论其为运动或为静止者,观者总随着其目光动态游移,不断悠游在视见的流变之中。然而感官的单向交流,曾几何时因为对“被看物”的认同甚至移情,观者本身不只身为一个观者,同时也是被看者,更甚者,观者成为观看自己者。当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看电影时的感动、激愤、伤心或者开怀,哪一次不是我们先让自己深陷影片情境



之中而产生一连串的反应。从观看到移情流动,恰好也是心理学乃至于结构主义学者们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颇为热门的议题,作为佛洛伊德的学生,当拉冈的镜像理论被导引到电影理论中,那些反映观看(甚至窥视)与被看的状态与过程的论述里,从来就不会把他遗漏掉;至于认同过程中的心理转变,从纯心理学到现象学,最后走到电影精神分析,这个变动的过程相当程度也反映了跨领域哲学家德勒兹的“流变说”,在他的游牧式思想过渡,就是强调将不同领域的知识与研究看成地底块茎,块茎间的细根彼此相牵相连,以达到流动、渐变。当电影理论两大学派在七十、八十年代的较劲僵持不下,承继拉冈以来的电影语言学派的梅兹对上承继本体论的影像哲学学派的德勒兹,已然开启影像面向现代的一个热闹走势。而读者们,您手上这本论文集,在论述现代的视觉文化效应与各种殊异言论时,巧妙地让上述论战得到颇为美好的联姻,我们发现不是文章中不约而同地引用了拉冈与德勒兹,而是作为现代影像论的主流,影像论述无法脱开这两股势力的笼罩。毕竟电影不管透过什么形式被观者接触到,终究还是得进行观看的动作。在不同诉求的论文中,我们也不不同程度地被带进现代影

像论的不同深浅境地,激荡着脑力也省察着自身的影像观。

编者之一的周英雄首先直接将电影这个大文本化约为“视觉”过程,并将歌德提到的成像(又称“后像”)留在脑海里久久不去看成某种幻象,这是众所周知的“视觉暂留”也是生成电影最主要的心理依据,由是他说:“…这个集子所要探讨的正是影像的幻象面向,尤其质问:二十世纪此时此地,影像底下所呈现的、传达的到底是哪些一般人视而不见,或项多是稍纵即逝,不易捉摸的现代性?”(页2)是故,“见”与“不见”也成为现代影像论述的重要课题,尤其经常在影像中“说”与“没说”的事,以及“说了但没被感知到”或者“没说却被感知到”,又如政治学家阿图塞说的“因为没有(说)所以有了(意义)”这句箴言那样左右现代主义思想。只是为何是“电影”,因为看电影“这种被动又充满激情的观看模式可以说是史上前所未见。”(页5)

作为被观看的客体,影像(或我们焦点集中在电影)本身具有可辨识的外观,而这外观显然与其所在语境有关,就像如果没看过车子就不会出现车子的概念,于是看到车子时也无法引发同感进行感知。然而电影如何是现在这个面貌,它有自己的历史;但我们同时还要问,是谁规定电影是这个样子,以及要电影给我们看到什么。这已经不只电影自个的事情了,而成为“管理众人的事”了,这个词我们显然不会太生疏,小学时课本上对于“政治”的定义,就是“管理众人之事”。于是乎,电影中除了谈政治,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手段。这本集子在进入理论论述之前,相当明晰地将“历史”这一项摆在前言之后,用意就在我们正式接触“观看”理论前先要有个心理准备,我们的观看对象总是有人操纵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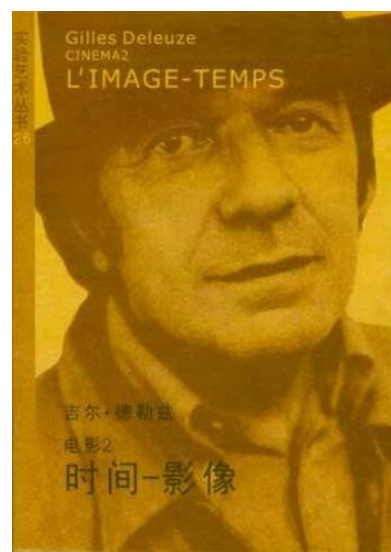
知名学者郑树森先来一篇热身作《黑名单·赖雅·张爱玲》,我们万不要以为本文是一篇“后一色,戒”现象。它从谈论美国麦卡锡主义电影《晚安,祝你好运》引发的动机写下这篇文笔流畅、章节分明,像是相当引人入胜的轶事小品,不论我们对书中被调查人物到底有什么样的认识(即使里头有我国文学名家张爱玲以及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至少我们粗略地了解了在那赤色恐怖下,演艺圈如何被卷入这场热斗中。而这一切,都是出自一种权力的操控。

“(纪登斯):‘出于一种欲望,为了报复世贸中心与五角大厦遭到攻击…探求这场战争与以色列的地缘政治利益(因此

很重要)。”(页 19)

法国电影理论家爱德加·莫兰写作著名的《电影，或想象的人》时，首章标题就叫做〈电影、飞机〉，而电影《神鬼玩家》中描绘的主人公霍华·休斯是飞行大亨兼电影大亨，电影作为美国两大主要工业（电影与航空）输出，其影响力本身当然不能小觑，“电影工业已成为二十世纪生活所有毛病一道德试验、文化混杂、好战的劳工运动以及中产阶级的行动主义一的化身，好莱坞自然被列为非美国主义的温床”(页 25) 所以好莱坞会成为麦卡锡主义排共意识里最主要，或说是最被大肆报导的清查领域也是无可厚非的，毕竟“好莱坞既然能够生产反共电影，当然也能够生产亲共电影”(页 28)，这样的思考相当自然，只是这一波的行动也自然地扼杀了许多创作者，造成人才的外流与迫害。电影的表态已然成为必要，李有成在《在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下》清晰地这份赤色恐惧与生产／分配的关系清楚地展示同时透过《岸上风云》、《日正当中》这类经典名片的案例提出正反诤词。

但我们依旧上电影院，观看可能已经被操控的影像，继而仍然在那流动中被牵引着。因为我们有着欲望，观看的欲望，可能更多是寻求认同，在那之前观者将试图进驻银幕上所反映的影像。拉冈的镜像论牵动了我们无意识童年的主体欲望，所以我们透过镜中的映像认识“他者”，进而希望成为他者，这个他者不是别人，正是我们尚不认识的自己，以及有时候还经由母亲领着照镜子中母亲的映像。这个主体认同，首先，张小虹先在《电影的脸》中将身体与面孔分切成两个独立个体，从四位理论家对于脸孔的论述整理起，而这些理论多从默片时代乃至于有声电影初期，也就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出于对影像本身的完全依赖，出于刚刚发现特写镜头的魅力，出于上镜头性这条铁律的忠诚，从最早的电影美学家之一的巴拉兹开始，直到重返电影物质本性的克拉考尔，其实这个理论的演进并没有脱离现代太远，以致于八十年代的德勒兹仍然强调了“面孔”的殊异性，而导出“面孔即特写，特写即面孔”的假说。自此，文集的方向已经从“历史”关注转往“观看”面向。只是当张小虹借用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的“第三义”说法来论述电影时：“只有静止状态的剧照，亦即在时间流变与运动延续中所截取的片断，才能提供影像的



‘内在’而非影像的‘运动’，展现出‘影片性’的特质。换言之，影像并不在电影作为‘动画’的影像运动中，而在电影作为‘静照’的‘画格’之中。”(页 44) 不就已经犯了德勒兹认定断片与停格已经使得电影“质变”了。于是乎，脸与脸之间势必存在流动，是一种从本质（嘉宝的脸）过渡到存在（赫本的脸）的过程，这需要借助动态流动。也是这种流动使得独立面孔与躯体不再分开，而成为主体的全体集合。当这些强调面孔的理论家批评视脸部为身体一部份的创作者或理论家的同时，是不是也忘却了“脸”作为影片（叙事）的元素之一，其实也得依赖（附）在影片（叙事）功能上，尽管它一旦出现在镜头上就已经具有言外之意；即使他们强调“电影不是故事，电影只有现在式的流逝影像，没有开头，没有中段，也没有结局。”(页 76)，但“为脸而脸”的脸终究还是成为‘事件’，成为动态的‘变异’”(页 48)，而隐没在影片之中。张小虹很巧妙地透过中文同音（或些微的转调）字汇特性重新演绎、分项对立这些外来的理论概念，就像物质本性的“唯物”情结到特写／面孔的“微物”情结；传统电影的“写实”到现代电影的“写时”。

假如说张小虹的文章在于探求电影中的脸作为被观看的原初客体状态，那么《悲伤母亲、逼真女人：阿莫多瓦〈我的母亲〉的动态显影》中，李秀娟则直接透过阿莫多瓦影作“我的母亲”里头各种由观看而来的互涉文本指陈出脱离个体如何在镜像互映下将同一性合一。这种合一除了来自共同特质的吸引，更来自个体间的认同。是故，阿莫多瓦影作中的众多女性“建构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我与他人疆界模糊的女人社群”(页 103)，这正好达到了法国新浪潮标杆尚-卢·高达曾经期望的境界：让五百、一千个演员演出同一个角色——既然这些人都会被成为“工人”的话。所以即使“所有”都来自人为操作而呈现，但如片名所示：“关于我母亲的一切”给的不是单一母亲的全部，毕竟影片的叙事是接在儿子的过世之后，而是影片这些真实存在的女性们指出了“关于我的母亲的一切”。

“美之追求，应是构成一切有限形式之美的绝对之美，故以不朽为最终目的。”(页 119)

但除了躯体的脱离，或者群像的同一性，“一为全、全为一”的共同欲望难道不会成为某种单一执迷的追求吗？《攻壳与人偶塔吉欧》暗示出在《威尼斯之死》中老作家奥森巴赫迷恋的年轻形象塔吉欧就像是动画《攻壳机动队》中对于无机的机械外壳的迷恋。而这“一具无灵魂肉身，不产生智慧而产生愉悦，启示者非神圣之不朽，而是俗世之必朽。”(页 117)：

为了不让完美人偶在印象中逝去，自己（这俗世的肉身）之毁灭成为必要之程序。于是“…变为人偶之道，或唯奥森巴赫敢于践履之：让自己变成无灵魂、无生命、如人偶般的尸 / 肉体，以是欢迎，并悦纳，那被开启的深渊般之无限。”（页 125）李家沅看似洞察地得出这个结论，所以电影中，一旦人物置放在空间中，则更加突显出欲传达的意念，于是当老人陈尸在滔滔大海之前，在不断的流动中停滞的躯体也因而将概念中的完美永恒地保留着了。

“漫游者与现代性密切相关…漫游固然着重于空间、行动、观看…以生动的方式，上演了认同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过程。”（页 137、156）

不是洲际，不是国别，而是都市。编者在文集中将四篇关于都市的论文一并收入，流动既然发生在固定两点“之间”，所以先要有定点，藉此突显现代下的漫游现象，或用德勒兹的术语：“（吟）游”。而前述关于历史、主体问题也都得置放在一个实存地域之中，一个流变的操作场域也因而被确定了下来。单德兴试着在《空间、族裔、认同：王颖的〈寻人〉》中“寻求”某种透过“寻找”过程获得的认同，并结合了黑色电影模式与漫游论述进行探究，却发现分析的影作中人物的“寻找”可能到最后是在“寻找果陀”，却忽略了既然是“黑”电影，一切证据本来就会有隐没的可能，这使得不完整的剧本在建构成完整影片的过程中也在“寻找”。于是“寻人者”终究也只能成为“漫游者”。

香港导演陈果的电影也在香港回归这个大背景之下，以处理移民/非法移民为主要人物对地域认同（主要来自香港与大陆关系）做出回应。冯品佳的《祸水红颜：〈香港有个荷里活〉中的性别与国族陈述》从影片中一对父子的共同欲望以及陈果在自己前后作品中展现的人物主导权的游移表现了性别（权力）与（国家）认同反转：“《榴莲飘飘》中的北姑被香港利用与滥用，而《香港有个荷里活》则反转了这种关系，显示出香港现在受到中国的影响至深…”（页 168），而这个国族认同



也在冯品佳敏锐地从陈果魔幻式的剧构设计中洞悉了其中的隐喻，这篇对单一地区及其幅员与邻近区域的地域位移探讨引出了《后殖民与全球化的东亚全球城市：从香港与〈细路祥〉谈起》从后殖民论述与祖国情怀对立下的全球化思考。文中透过电影人物对祖国回归的期许与盼望，一方面反映时局的需求与政治正确观的展现；二方面也突出在想象—移情作用下对逃离的祖国重新认同。在这层对于回归欣欣向荣似的期许也在影片中还香港以自己的本貌，黄宗仪在文中如是说：“…看似平凡的柴米油盐的生活琐事与人情来往是借着把寻常生活琐碎的点滴拼凑成图像，呈现个人对城市的感知经验，有别于香港的刻板印象。”（页 181）

李纪舍则稍稍从认同的角度抽离，试图从两部本身即含有跨都市空间处理的作品从内部与外部交叉比下，衍生出空间的认同性更重要来自于情感的迭加。《台北电影再现的世界主义空间政治：杨德昌的〈一一〉和蔡明亮的〈你那边几点〉》点出的世界主义，其内在核心也就是一种世界的共时并存观念，这种并存串起了所有存在当下的生命状态，形成天涯若比邻的体现。进一步才在情感的灌输下，将不同国度的城市联系了起来：日本—台北：女子希冀情感复燃被拒在两地留下的眼泪；巴黎—台北：两地对时以期能无时差并以看电影连接共同体验。

“情书原来都总是老早就拟好了的。”（页 265）

文集最后以“欲望”这个主题收录了两篇文章，一是从“酷儿”电影的形塑过程探究性别倒错与主体认同，张霭珠的《新酷儿电影的抵抗美学与酷儿主义操演：析论海因兹的〈毒药〉与〈丝绒金矿〉》我们更多地从爱滋传染恐惧中感受到吸血鬼情结的有着类似的内在体现，甚至我们可以遥想文集之初对于赤色恐怖蔓延，也在于对“感染”的惧怕，而这种惧怕又像是张小红文中对面孔动态过度的一个阻断，也是对李秀娟的“逼真女性”的弃绝。但电影在观众接触之前业已完成了，不论观者将如何不同地感知，它已经透过人为角度先行掌握了发言权而决定了入不入镜的取舍，只等着观众对号入座。余君伟以颇为独特的角度论述了欲望的运作，并将读者重新拉回可能因为阅读已然遗忘的观影镜像认同论。他在《幻象、宿命、重述性——论电影〈吸血鬼〉与〈瓶中信〉中的爱情迷思》中揭橥的是“窥视者看到的只是‘不在之物’，透过它却可以幻想出世界上最美妙的东西”（页 256），亦即观者在已经被挑选过的影像中再次搜寻想见的部分而自动再做一次筛选的动作。这种移情关注的潜意识只不过就像“那三位（《天方夜谭》里等待阿里巴巴的）高人一样，一直默默等待，就等到某



一刻因为你偷听到某人说的话、遇上一件小事，忽然勾起一些早已经遗忘的伤心往事，潜伏已久的病征可能就这样一发不可收拾。”（页 259）因而从银幕上映照出的影像也就只是观者希望映照出的那个样子。

于是，欲望兜了一圈，回到了主体身上，完成了一次从欲望出发，经过寻找同时进行主体与空间认同过程，并在政治／权力操控下的再现中观看并满足原初的欲望与想象。流变在这一循环过程中不断幻化，但最终的回归到底有变、没变，似变、非变？于是牵引着我们思考，到底我们的“想见”是否被再现了？我们的“没见”是因为没展现还是我们“视而不见”？或者没被再现的却因为我们的想见与想象而被填满，因而被感知？这个文集或许没有解答，因为它们也在探究。但或许终究像是爱伦坡那封“被窃的信”一样，不论对象是谁，一旦信写成了，就一定会寄达。影像，也等着观者进到属于他的位置。

周英雄、冯品佳：《影像下的现代：电影与视觉文化》，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7 年 08 月 01 日。

## TRANSLATION 译介

### 破产后的生活——哈贝马斯采访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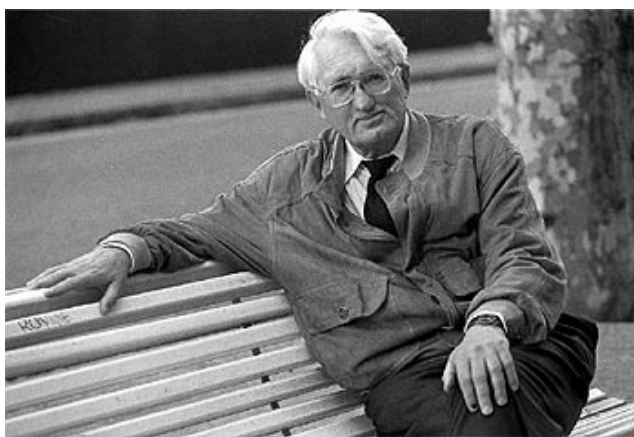
《时代周报》(Die Zeit) 托马斯·阿斯豪尔 (Thomas Assheuer)

翻译：吴万伟 (武汉, wuwanweione@yahoo.com.cn)

私有化时代已经结束。负责推动公共利益的角色是政治而不是市场。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接受《时代周报》记者托马斯·阿斯豪尔 (Thomas Assheuer) 的采访，谈到国际秩序的必要性。

《时代周报》：哈贝马斯，国际金融体系崩溃，全球性经济危机近在眼前。对此你最担心的是什么？

哈贝马斯：我最担心的是令人愤慨的社会不公，最脆弱的社会群体必须承受市场失灵造成的社会化成本。从来都不是全球化胜利者的民众现在却不得不为可以预料的金融体系崩溃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买单。他们和股东不同，不是承担货币价值上的损失而是维持日常生活的硬通货的减少。从全球角度看，遭到报复的命运也落在经济最弱的国家身上。这是政治丑闻，但用手指着替罪羊大声谴责让我觉得很虚伪。投机家一直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活动，根据社会承认的利润最大化的逻辑行事。当政治诉诸于道德化而不是依靠民主立法者制订可以实施的法律时，就把自己变成了笑柄。负责推动公共利益的角色是政治而不是市场。



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时代周报》：你最近在耶鲁大学演讲。这次危机给你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什么？

哈贝马斯：在佛罗里达和其他地方看到的如画家霍珀 (Hopper) 的作品那样让人伤感的景象，电视屏幕上闪现的似乎没有尽头的长排空荡荡的房子，房前草坪上有因房贷拖欠收回房产的标志牌。接着你看到载着来自欧洲和富裕的拉丁美洲的潜在买主的汽车一辆辆开过来，接着是房地产代理人向他们展示卧室壁柜里隐藏着的愤怒和绝望。回国后，我感到印象深刻的是美国激动焦虑的情绪与德国“像往常一样”的平静心态形成的鲜明对比。在美国，真正的经济焦虑碰巧和最近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选举的冲刺阶段重合。危机也让选民更真切地意识到在更广泛背景下的个人利益所在。它强迫人们在做

出决定时，比上次大选因为 9-11 袭击而产生的意识形态两极化更加有道理些，如果不是更理性的话。如果我在选举前冒险做个预测的话，美国将拥有第一位黑人总统，因而成为政治文化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这都归功于幸运的巧合。但除此之外，危机也可能是欧洲变化了政治气候的一个预兆。

**《时代周报》：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哈贝马斯：这种潮流变动影响到公共讨论的晴雨表，影响到在此过程中被看作政治选择可能性的光谱变化。朝鲜战争标志着新政的结束，里根、撒切尔夫人以及冷战的结束则标志着社会福利项目的结束。在布什时代的终结、上次新自由主义修辞气球的破裂、克林顿和新工党项目的表演过后，接下来会是什么呢？我的希望是人们不再从表面上接受新自由议程，而是把它搁置起来；严格审查让生活世界完全听命于市场指令的整个体制。

**《时代周报》：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口号，国家不过是经济领域的一个演员，应该尽可能发挥小的作用。这种思维方式现在声名狼藉了吗？**

哈贝马斯：这取决于危机的未来走向、取决于政党的概念表述能力、以及成为公共议程的话题。在德国，无论如何，情况仍出奇地平静。优先考虑股东利益，对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弱势群体的出现、儿童贫困漠不关心的议程已经失去人们的信赖。因为对私有化的狂热，该议程已经让国家核心功能空洞化，把精心考虑的公共领域残余出售给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投资者，把文化和教育的命运交付给随着市场波动而变化的资助者的利益和情绪。

**《时代周报》：私有化狂热的后果在金融危机中变得清晰了吗？**

在美国，布什政府推行极端的取消管理的政策，造成物质上、道德上和文化上的明显破坏，这次危机已经恶化了。社会保障和医疗健康、公共交通、能源供应和养老金体制和刑罚制度、军事安全服务，学校和大学的大部分私有化，城市和社区文化基础设施交由私有赞助者的承诺和慷慨是社会设计的一部分，它们风险和后果是很难与社会民主宪政国家的平等原则相吻合的。

**哈贝马斯：国家机构不能按照经济原则和企业做生意。**

是的，但是某些脆弱的生活领域，比如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股票，不应该暴露在股票市场投机的风险之下。在民主国家，比如不受扭曲的政治交流等公共利益不能被扭曲，以便符合金融投资者的利润追求；公民的知情权不能靠商业电视台主导的媒体文化来满足，这样的世界里充斥着容易消化、无需思考的词语。

**《时代周报》：如果引用你的一本引起争议的的书的书名，我们是在经历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吗？**

哈贝马斯：自从 1989 年、1990 年后，要摆脱资本主义世界已经不可能了，唯一的选择是从内部将资本主义动力学文明化和温和化。即使在后战争时期，苏联也不是东欧大部分左派眼中的可靠选择。这就是为什么在 1973 年我写了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这些问题再次进入议程，根据国家的情况，其紧迫性不同。这种情况的症状之一是要求设定经理薪水的最高界限、取消“金色降落伞”(golden parachutes)也就是高级管理层的丰厚补偿和奖金。

**《时代周报》：但是这些政策难道不是橱窗效应吗？明年将有很多选举呀。**

哈贝马斯：是的，这当然是旨在转移人们关注政客及其经济顾问的失败的象征性政策。他们早就知道金融市场监管的必要性了。我刚刚重新阅读了施米特(Helmut Schmidt)在 2007 年二月在《时代周报》上的文章“管理新的超级投机者”，

人人都非常清楚发生了什么，但是在美国和英国，政治精英认为只要情况正常，放肆地投机就是有用的，欧洲则屈服于华盛顿共识。在这方面有更广泛的意愿同盟，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先生无需做广告。

**华盛顿共识是臭名昭著的经济计划，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九十年代制订的计划，据说提供了经济改革的模板，首先是拉美，然后到半个世界。其中心承诺就是“滴漏”：让富人更富，财富就将渗透到穷人身上。**

这个预测的虚假性的证据已经堆积很多年了。富有者财富增加的影响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非常不平衡，我们看到的贫困区域越来越大。

**《时代周报》：让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过去：它是怎么出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结束让资本主义失去任何约束了吗？**

哈贝马斯：民族国家和凯恩斯经济政策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形式虽然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富裕，但它在更早的时候就终结了，在放弃了固定汇率体制和石油危机的时候。到了里根政府和撒切尔夫人政府时期，芝加哥学派经济理论已经获得实际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克林顿政府和新工党下继续，那时候就有我们现在的英雄，当时英国的财政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但苏联的崩溃导致了西方致命的胜利主义，成为世界历史胜利者的感觉是十分诱惑人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政策理论也就迅速膨胀，成为延伸到生活各个方面的世界观。

**新自由主义是生活方式。所有公民都应该成为自己劳动力的经营者，而且成为消费者…**

…和竞争者。在人人自由的竞争社会里赢得胜利的强者可以宣称，他的成功是因为个人的美德。具有非常滑稽色彩的是，经理们，当然也包括其他人成为谈话节目中荒谬的精英主义言论的猎物，浑浑然当真把自己当作角色模范，以为在思想上高高在上，优越于他人，好像他们不再愿意承认现代社会早期功能精英和财富精英之间的差异。以半吊子水平窃据高位的人在性格和思想上有什么值得显摆的呢？另外一个警讯是 2002 年秋天出台的布什主义确立了入侵伊拉克的基础。市场极端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从此在社会政策和外交政策中变得清晰可见。

**但布什不是孤独的。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周围集满了有重大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

但很多人什么也没有学到。著名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家如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伊拉克灾难后运用掠夺性的术语思考（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问题已经越来越明显。最近，他对国际政治陷入核武器武装起来的越来越不受限制的权力斗争前景的评论是：“世界恢复到了正常状态。”

**《时代周报》：重复一下，在 1989 年后在政治上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是否因为资本比政治强大太多了？**

哈贝马斯：在我看来，在九十年代，如果要赶上市场的发展的话，政治必须建立起在超越国家水平上采取共同行动的能力基础上，这是很清楚的。在这个十年的初期甚至有朝这个方向前进的最初步骤。老布什以纲领性的方式谈论新世界秩序，似乎想利用长期以来遭到封杀和嘲弄的联合国。由安理会实行人道主义干涉的数量开始有明显的增加。带有政治意图的经济全球化本来应该促成全球政治合作的体制以及更进一步的国际关系法律框架化的，但最初混乱的努力在克林顿时期就已经失去了影响力。如今的危机让我们再次认识到效率低下的现实。自从现代时代开始，市场和政治就不得不重复地相互制衡以便保存政治圈子内成员的团结关系的网络。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张力一直存在，因为市场和政治建立在相互冲突的原则基础上。摆脱了更复杂网络束缚的去中心化个人选择的泛滥在经过了全球化的最后阶段后也要求得到管理，同时发生的还有产生众多利益的政治程序的扩张。

**《时代周报》：这意味着什么呢？你继续支持康德的世界主义，鼓吹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泽克（Carl Friedrich von**



**Weizsäcker)的全球性国内政治的观点吗？这听起来完全是幻想，我们该怎样思考呢？毕竟，你只需要考虑联合国的现状就明白了。**

我必须承认联合国核心机构的彻底改革不可能走很远。当然，安理会、秘书处、国际法庭、以及笼统意义上的这些机构的权力和程序必须是作为紧急事件，适合于全球实施人权和实际上禁止暴力，本身就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即使联合国宪章被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宪法，这个框架仍然缺乏一个论坛，其中大国间的军事斗争将被转变为制度性协商，用来讨论需要管理的全球经济问题，包括气候和环境政策、竞争性能源的分配、稀缺的饮用水供应等问题。这种跨国层次上的分配问题不能用人权侵犯或者国际安全破坏那样的方式处理，在可以起诉的犯罪这样极端的例子，而是必须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找到解决办法。

**负责处理这些问题的机构已经存在了，比如八国集团。**

这是个排外的俱乐部，这些问题中的一部分以没有约束力的方式被讨论过。实际上，在对这些事件的夸张宣传引起的期待和媒体盛宴过后产生的可怜结果之间存在的差异就足以说明，国民虚幻的期待的警醒他们，或许甚至各自的政府更清楚地认识到未来全球政治的难题。

**这听起来就让人怀疑，简直是白日梦。**

就在几天前，大部分人还认为今天发生的事不可能是真的。欧洲和亚洲政府竞相提出管理建议来对付金融市场上效率低下的制度化问题。甚至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社会民主党（SPD）也提交关于会计规则和资本充足率管理规定的建议、经理个人债务、对股票市场加强监管、提高透明度等。当然，很少有人提到对股票市场交易征税，如今征税政策已经逐步全球化。不管怎样，大肆夸耀的新“金融体制建筑”如果遭到美国的抵制是很难实施的。考虑到这些市场的复杂性和对于最重要的功能体系的世界范围的相互依赖性，很难说它能走多远。现在各方心中想的国际条约可能在任何时候被取消，根本无法提供无懈可击的政权基础。

**即使新权力被转移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不等于全球内部政治。**

我不想做出预测。考虑到问题的规模，我们能做的主要是思考建设性的提议。民族国家必须明白自己作为国际社会成员实际上是符合自身利益的。这是未来几十年需要处理的最艰巨任务。当我们心中想着这个舞台说“政治”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继承了做出主权决策的集体所自我理解的政府行动。但是今天把国家作为利维坦（Leviathan）的自我理解的持续性已经遭遇自从十七世纪以来欧洲国家体系合作发展的体制的冲突而中断。在国际领域中所说的“政治”的内容和构成处于不断变化中。

**《时代周报》：但是它如何适应国际关系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正如你提到的，在 9-11 之后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全球政治舞台上越来越明显？**

哈贝马斯：或许我们应该后退一步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看待这个问题。自十八世纪后期，法律已经渐渐充满政治性构成的政府权力，在国内领域已经剥夺了国家作为“强制力”的大部分特征，但是在国际关系上，国家仍保存了足够多的内容，虽然相互交叉的国际组织逐渐增多，国际法的约束力也越来越强。民族国家形成的“政治”概念一直处于变动状态。比如，在欧盟内部，成员国继续享受合法武装的垄断权，但是在实施超越国家层次上通过的法律时并没有多少犹豫和顾虑。法律和政治的这个转变也和资本主义活力联系在一起，这种活力能够被描述为阶段性互动在功能性推动下开放，紧接着出现由更高层次上进行社会融合的封闭性。

**《时代周报》：这是否意味着市场把社会撕裂，福利国家又把它融合起来？**

正如我们现在了解到的，福利国家是后来的，是非常脆弱的成就。扩张的市场和通讯网络已经产生爆炸性力量，同时对于个体公民产生个人化和解放的后果。但是每一个破坏都紧跟着出现更全面的体制框架内团结的老关系的重新组织。在一个更加全面的机构框架内团结起来的从前关系的重新组织。这个过程开始于现代初期，中世纪盛期主导性财产在新的领土国家范围内逐渐被英国那样的议会所控制，或被像法国那样的由绝对的君主来调解。这个过程持续到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宪法革命出现和二十世纪的福利国家立法项目。这种对利维坦的合法约束和公民社会内的阶级对抗决不是小事。因为同样的功能理由，这种成功地将国家和社会宪法化的做法在经济全球化更进一步后的今天，正朝向将国际法和争吵不休的国际社会宪法化。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欧洲能发挥的作用是什么呢？**

哈贝马斯：不是它在危机中实际发挥的作用。我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欧盟最近的危机管理受到如此高的赞扬。戈登·布朗能够用他让人记忆深刻的决定让美国财长保尔森重新解释竭力协商的紧急援助，因为他让欧洲区最重要的选手参加进来，通过法国总统的协调，最初遭到默克尔（Angela Merkel）以及她的经济部长施泰因·布吕克（Peer Steinbrück）的反对。你只需要更仔细地考察这个协商过程和它的结果。正是欧盟内联合起来的民族国家中的三巨头同意作为主权角色协调不同的措施碰巧指向共同的方向。尽管有欧盟官员容克（Juncker）和巴罗佐（Barroso）的在场，达成这个经典的国际协议的方式几乎和欧盟联合的政治意志形成没有任何关系。《纽约时报》不是没有一点恶毒含义地指出，欧洲没有能力就共同的经济政策达成一致。

**《时代周报》：你怎么解释这事？**

哈贝马斯：危机的当前路径让欧盟建设中的错误突现出来：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经济措施做出反应。因为某种程度上简化的欧盟能力被分割，由布鲁塞尔和欧洲法院实施经济自由，造成的外部成本被摊派给各成员国，目前在经济政策层面上没有形成共同的意志。最重要的成员国甚至在原则问题上存在分歧，比如国家占多少，市场占多少是合适的等。而且，每个国家都在推行自己的外交政策，德国尤其如此。尽管其外交不动声色，但柏林共和国似乎忘了从前的联邦共和国的历史教训。政府在利用自1989年到1990年以来获得的外交政策上得到扩展的操作空间，回到熟悉的国家间民族权力政治的熟悉模式中，虽然后者已经早就缩略为小公国的模式。

**《时代周报》：但是这些小公国能做什么呢？下一步是什么呢？**

哈贝马斯：你在问我的希望清单吗？因为在当前条件下，我认为逐渐融合或者不同的融合速度是唯一可能的场景来克服现有的停滞，萨科齐的欧洲区经济政府的建议可以作为起点。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接受国家主义的背景假设和赞助人的保护主义意图。程序和政治结果是两码事。经济政策领域的“更紧密合作”肯定要求外交政策上的“更紧密合作”跟随其后。任何合作都不再能靠着人民进行的密室交易方式来完成。

**你甚至不愿意在社会民主党内支持它。**

社会民主党领袖正把这个观点让给基督教民主党的领袖，莱因和鲁尔区的“劳工领袖”尤尔根·吕特格斯（Jürgen Rüttgers）。整个欧洲，社会民主党都处于绝境，因为他们因为筹码削弱被迫玩零和游戏。他们为什么不抓住机会逃脱国家的牢笼，在欧洲层次上获得新的操作空间呢？这样的话，他们甚至能和左派退化的竞争分离开来。不管“左”“右”今天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只有团结起来，欧洲区国家才能在世界政治中获得足够的重量，才能在全球经济议程上发挥相当的影响力。另外的选择就是扮演山姆大叔的追随者，听凭全球形势发落，这个形势既混乱又危险。

《时代周报》：说到山姆大叔，你肯定对美国非常失望，在你看来，美国应该是新世界秩序的起草者吗？

哈贝马斯：除了把赌注押在这个起草者上还有其他选择吗？美国从现在的双重危机下出来肯定会遭到削弱，但它仍然是目前的自由超级大国，人们可能鼓励它全面检查作为家长式全球恩主的新保守主义自我形象。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出口自己生活方式的做法来自古老帝国虚假和中心化的世界主义。而现代性建立在平等尊重每个人的去中心化的普遍主义基础上。美国放弃排斥联合国的立场不仅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可以把自己放在改革运动领袖的位置上。从历史上看，四个因素的汇合代表了不大可能的格局--超级大国地位、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国家、希望出现的一个崇尚自由、有世界眼光的总统、让人印象深刻的推动产生规范动力的可靠政治文化。今天的美国深受单边冒险失败的困扰、新自由主义的自我摧毁和例外主义意识的泛滥。这个国家为什么不能像历史上经常做的那样，试图把当今竞争的大国团结起来，要是进入一个不再需要超级大国的国际秩序时代，就来不及了。在重要的转折关头上台的美国新总统为什么不能在国内领域的行动范围受到严重限制的时刻，至少在外交政策上抓住这个呼唤理性，需要理性的好机会呢？

所谓的现实主义者可能面带勉强的微笑抛弃你的建议。

我知道这个建议可能遭到很多人的反对。美国新总统将要战胜俯首帖耳于华尔街的党内精英的抵抗，也肯定被劝说不要屈服于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本能反应。美国需要忠诚然而自信的盟友的友好支持以便做出改变方向的激进决策。创造性意义上的“双极”的西方是有可能的，但只有在欧盟学会在外交政策上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用国际上累积的信任资本开展有远见的行动的情况下。也就是“是的，但是”模式。危机时刻更需要更宽广的视野，而不是主流建议和往常政治上的小打小闹。

该访谈最初发表于 2008 年 11 月 6 日《时代周报》；英文翻译版权归 Polity 2009 所有，并由该出版社(Polity Press)授权在“signandsight”发表。该采访将被收录入哈贝马斯的《欧洲：摇摇欲坠的工程》(Polity, 2009)。

德译英：Ciaran Cronin

译自：“Life after Bankruptcy”，<http://www.signandsight.com/features/1798.html>

原文请见：<http://www.zeit.de/2008/46/Habermas?page=all>

授权网络首发媒体：[学术中国·阅读在线](#)

授权纸面首发媒体：[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搜狐新闻  
news.sohu.com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mailto:shrbooks@gmail.com)，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题，敬请来信告知。